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2期(民國110年6月),101-16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戰後東北問題與遠東冷戰的開展*

黃自進**

摘　要

本文擬從戰後冷戰的發展脈絡,重新審思美國政府如何面對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失敗與改採「棄中扶日」政策,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為釐清美國政府如何將原本扶植的對象由中國改為日本的來龍去脈,本文首先探究蔣介石、毛澤東兩人以及美蘇兩國對東北接收與國共和談的基本態度,繼而討論蔣介石與美國之間意見日趨分歧、毛澤東與蘇聯之間意見日趨整合等情勢的演變,對蔣介石、毛澤東兩人在東北布局所造成的具體影響。最後,再聚焦探討美國政府如何反制蘇聯的背信與中共的崛起,並援用圍堵政策,改以扶植日本政府作為東亞反共堡壘。

關鍵詞: 戰後東北、冷戰、國共和談、圍堵政策

* 收稿日期:2020 年 7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 年 3 月 26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　言

戰後東北問題複雜性的根源，來自於中國不具備單獨行使收復失土的軍事實力，因而使得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接收東北，除了要得到國際強權的支持以外，還得接受強權之間針對遠東地區勢力劃分所達成的解決方案。以前者論，中國得以收回東北，是 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國元首於開羅會議（The Conference at Cairo）所達成的共識；以後者論，同意恢復帝俄時期俄國（日後的蘇聯）在中國東北所享有的特殊權益以及支持蔣介石繼續執政和尊重美國可享有重整中國國內秩序主導權，則是 1945 年 2 月，美、英、蘇三國元首於雅爾達會議（The Yalta Conference）、以及 1945 年 12 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於莫斯科會議（Moscow Conference）所達成的共識。

戰後東北主權之所以會經歷一連串國際會議的反覆認定，在在反映戰後中國東北問題，不僅是戰後遠東國際秩序重整的一環，也代表美、英、蘇三國列強嘗試運用協商體制謀求解決東北問題的初步成果。是以，東北接收的失控，不僅代表戰後國共和解的破局，也代表三國和平重整遠東國際秩序的失敗。尤其是國軍接收東北的失敗，除了與國府在大陸的全面潰敗有關，與美國為求反制蘇聯的背信及中共的崛起，決定改採「棄中扶日」政策，讓圍堵概念成為戰後美國推動遠東政策的核心理念，也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

蓋東北接收，也因其歷史意義之深遠以及所涉及範圍之廣大，使得本議題的研究，成為各方學者作為探索國共內鬥或戰後遠東史的最佳線索。例如以國共內鬥為主題的研究者，就以東北接收為焦點，詮釋中共的崛起或國民黨的失敗。以前者而言，Steven I. Levine 就以中共在東北地區基層的耕耘有成為論述焦點，認為中共在東北的成功，除了得到農村群眾的支持以外，城市居民的支持也扮演重要角色。[1]而 Harold M. Tanner 則以重新檢驗 1946 年 4 月四平戰役

1 Steven I. Levin,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爲研究線索，解析共軍爲何能敗而不潰，以及國軍如何受制於美蘇兩國的相互制衡，所以無法乘勝追擊，兩者所造成截然不同的結果。[2]此外，楊奎松以中共因能善用「中間地帶」的理論爲主題，認爲中共的勝利，除了成功利用美蘇相互牽制的模糊空間，適時推動武裝奪權的既定政策以外，也能及時得到蘇聯的援助。[3]以後者而論，陳立文雖將國民黨的失敗，歸咎於蘇聯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背叛，但也具體指陳國民黨在簽訂相關條文時的疏忽。[4]而汪朝光則聚焦於國民黨何以無法取得蘇聯合作，探索東北接收失利的前因後果。[5]

另一方面，也有以馬歇爾的調停爲研究線索，探索調停失敗與東北局勢失控的互動關係。例如牛軍將東北局勢失控歸咎爲美國政府在執行調停政策時，將扶植國民黨繼續執政視爲首務，而視國共兩黨和平解決紛爭爲次要，也因馬氏的處事不公，使得蔣介石毫無忌憚地發動內戰。[6]鄒讜則將馬氏調停失敗的主因，歸咎爲美國政府雖一心想維繫國民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但又不願過度捲入國共內鬥。這種矛盾心態，讓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既不願與中共相善，卻又不願全力支持國民黨，使其只能原地踏步，一直陷於兩難之中。[7]而關中卻認爲國民黨不能適時利用馬氏的調停與中共達成協議，反而讓內戰擴大的主因，除了太低估中共的實力以外，也過於高估美國政府的支持意願。[8]至於邵玉銘，

---

2 Harold M. Tanner, *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 Siping, 194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出版社，2010）。

4 例如大連港的定位模糊以及沒有事前商議設置與蘇聯軍隊同行的接收機構等等。陳立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之背景、經過及其檢討〉，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1），冊 2，頁 362-392；陳立文，〈從東北接收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收入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上冊，頁 312-344。

5 汪朝光，《和與戰的抉擇：戰後國民黨的東北決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6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7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8 關中，《中國命運．關鍵十年：美國與國共談判眞相（1937-1947）》（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10）。

也認為蔣介石堅信美援必來，是他不願與馬氏妥協的主因，而太早自絕於與蘇聯的往來，亦是蔣氏在東北局勢失控以後，陷於孤立無援的原由。[9]

而以國際關係為視野的研究者，更使此一議題的探索主軸包羅萬象。這些研究，皆旨在從國際政治的脈絡中，試圖從東北接收對戰後國際政治的演變，尤其是中共政權的建立、國府的退守台灣，中共與蘇聯的結盟以及韓戰的爆發，提供更豐碩的背景知識。[10]尤其是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以東北接收與雅爾達體制的建構與崩潰之間的互動關係為研究重心，探索中共政權因何得以成立之經緯。[11]沈志華除了將戰後中共的入主東北，視為中共與蘇聯實質合作的重要事證以外，也將此事視為是奠定日後中蘇同盟體制得以建構的基礎。[12]然而以上所述的既有研究，雖皆各有所長，並有所建樹，但對於美國如何面對國府接收東北的失敗，又如何反制並尋找新的替代方案之研究，至今卻仍然罕見。

有鑑於此，本文特從戰後冷戰形成的關鍵時間點為出發點，尤其是從美、蘇兩強在全球戰略對峙的格局中，加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角色，釐清美國為反制共產勢力在遠東地區的擴展，如何將遠東亦納入其推展圍堵政策之一環，並將原本扶植中國的計畫改為扶植日本的一連串轉變過程，藉此說明美國因東北局勢的失控而終止調停國共內鬥的始末，以及美國又如何因中國爆發內戰，而調降對中國的評價，進而興起扶植日本，以代替中國成為美國在遠東政策代言角色的來龍去脈。為此，本文首先探究蔣介石、毛澤東兩人以及美蘇兩國對東北接收及國共和談的基本態度，比對蔣介石與美國之間的意見日趨分歧與毛澤東及蘇聯之間的意見日趨整合等情勢的演變，對蔣介石、毛澤東兩人在東北布局所造成的具體影響。最後，再聚焦於探討美國政府與蔣介石之間的

9 邵玉銘，〈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頁 43-109。

10 陶文釗，〈馬歇爾使華與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世界歷史》，1986 年第 2 期，頁 40-48；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15）。

11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沈志華，《冷戰的轉型：中蘇同盟建立與遠東格局變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隔閡，以及美國政府又如何因中共的得勢而決定棄守國府，改以扶植日本政府作爲遏制共產主義在遠東擴展的反共堡壘之經緯。

二、東北接收與美蘇兩國的互動

1945 年 10 月 12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簡稱「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抵達長春，正式啓動國府的東北接收工程。他於翌日拜會東北蘇軍最高長官馬林諾夫斯基（Rodion Y. Marlinvoski），並向他提出運兵計畫以及請求協助接收各省市政權。[13]

按國府規劃，接收東北，大要可分爲民事及軍事兩大部門，前者盼望能順利接收滿洲國各省縣市層級的行政體系，[14]後者擬派遣 5 個軍進駐東北，[15]以求維繫境內的治安秩序。然沒有大軍相隨，只有行政機構先行，這種布署方式，在在反映國府自始就將東北接收視爲盟國合作體系內的戰後善後工程之一環，深信蘇聯政府將會秉持善意，全力協助國府順利完成東北的主權接收業務。

（一）中蘇初期交涉的障礙

然令人意外的是，當東北行營於 10 月 13 日提出擬由大連登陸的運兵計畫時，馬林諾夫斯基卻表示此一提案須由兩國政府協商解決，但強調若改由營口、秦皇島、安東三口岸登陸，他不反對。至於希望蘇聯提供飛機輪船運送中國接收部隊，他建議應由中國政府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16]國府爲求能早日展開接收工作的實質作業，特分兩個不同層次，分別與蘇聯政府進行協商。首先，仍由駐守行營的熊式輝及外交特派員蔣經國出面，於 10 月 17 日會晤馬林諾夫

13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冊 4，頁 408。

14 〈我駐蘇軍代表團團長董彥平報告書〉（1946 年 7 月 12 日），收入秦孝儀編（下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冊 1，頁 219。

15 〈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有關東北接收情形報告〉，收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冊 1，頁 215。

16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2015），冊 8，頁 208。

斯基時提出六事：一、修理瀋陽至山海關鐵路，使之通車。二、修理瀋陽經熱河至古北口鐵路，使之通車。三、中國準備接收郵電及長春以外鐵路。四、中國準備接收僞滿銀行。五、由中國編練地方團隊。六、行營派人赴各地視察。[17]

復次，10 月 18 日，蔣介石在重慶直接與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A. A. Petrov）洽商，除了重申國軍仍希望在大連登陸的初衷以外，並表達可將原借用美軍運送軍隊的計畫改擬爲借租蘇聯軍艦。[18]然 10 月 24 日，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在請示史達林（Joseph V. Stalin）後，仍拒絕國軍擬在大連登陸的原定計畫，理由是「大連爲一商埠，如我軍在大連登陸，無異破壞同盟條約」。[19]

從雙方初步協商過程，可知對峙的僵局，在於大連是否可供國軍登陸之用，爭執的主要關鍵還是在於雙方對中蘇同盟的認知不同，而箇中原委，只得藉由中蘇同盟的成立經緯及時空背景中找尋線索。蓋兩國同盟關係的確立，緣於兩國外交首長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下簡稱《中蘇條約》）。按條約的內容，雙方的同盟基礎在於蘇聯願意：（一）承認國府的執政地位；（二）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及領土完整；（三）保證不干涉內政及定期從東北撤兵等 3 項要旨，而國府則以（一）承認外蒙古獨立；（二）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允歸中蘇共有；（三）大連開爲自由港，行政權屬於中國，碼頭倉庫之一半由蘇聯租用；（四）旅順作爲中蘇共用的海軍基地作爲回應。[20]

若按雙方所簽訂的條約內容來看，大連雖被定位爲自由港，但行政權卻仍歸屬於中國所有，在中國仍擁有主權的前提下，中國自有任意使用的權力，故

17　〈熊式輝蔣經國等電蔣中正報告接收東北與蘇交涉經過情形〉（1945 年 10 月 1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103-00064-007，「日本投降（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4，頁 410。

18　〈蔣中正日記〉，1945 年 10 月 18 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原件（以下略藏地）。

19　〈蔣中正日記〉，1945 年 10 月 24 日。

20　〈外交部長王世杰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部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文〉（1945 年 8 月 14 日），收入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冊 2，頁 652-658；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頁 697。

史達林以自由港爲運輸商品所用，不得運輸軍事人員與物資爲託詞，拒絕國軍登陸大連，自是強詞奪理，亦是出乎國府的意料。

對蘇聯無意允許國軍在大連登陸之事，蔣介石早於 10 月 6 日就藉由駐蘇大使傅秉常的電報而耳聞此事，[21]他於當日的日記中，指陳史達林此舉，「此或爲美軍近日在秦皇島、天津登陸之故，使之疑忌嫉妒，而有此事」。[22]也就是說，蔣在初聞此事時，只是將其視爲是史達林的一種情緒反應，不必在意以外，也認爲國軍登陸大連或仍有轉圜空間。[23]

但爾後的發展，誠如前文所述，史達林一直持嚴拒態度。對於史達林的堅持，時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於 1945 年 11 月 26 日的國防最高委員會報告中，從美國的角度，一語道破東北問題糾結的關鍵，[24]在於「最近美國總統代表向顧大使說，你們的困難是不可避免的，蘇聯以爲日本在美國手裡，管理日本，我們不能來，現在東北在我手裡，我也不放鬆。」[25]

故從蔣、王兩人在面對中國接收東北的問題上，爲何會遭遇蘇聯的惡意阻擾，解讀上雖有層次的不同，但皆將問題的根源歸咎爲美蘇抗衡一事來看，欲理解中蘇兩國在東北面臨僵局的癥結，首要在於需瞭解美蘇關係的互動爲何會影響東北的接收。

---

21 〈傅秉常致外交部電蘇俄政府聲明堅決反對任何軍隊在大連登陸〉（1945 年 10 月 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01-018，「革命文獻－接收東北與對蘇交涉（一）」。

22 〈蔣中正日記〉，1945 年 10 月 6 日。

23 例如在當天的日記中，蔣云：「俄態度喜怒無常、風雨不定，惟視其一時利害與形勢而變，余並不以此介意，仍照預定方鍼，忍氣吞聲，據理進行，料彼在此時不敢蠻橫到底，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蔣中正日記〉，1945 年 10 月 6 日。

24 此一觀測是來自國府駐英大使顧維鈞於 1945 年 11 月 1 日向王世杰報告，他在倫敦與美國次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的談話內容。〈顧維鈞致王世杰電〉（1945 年 11 月 2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外交部》，檔號 11-INO-00120，「聯合國總卷」。

25 顧大使意指顧維鈞。〈外交部長王世杰在重慶與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交涉接收東北報告〉（1945 年 11 月 26 日），收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冊 1，頁 214。

（二）東北接收與遠東國際政治

對蘇聯政府而言，東北接收不僅涉及蘇中兩國對《中蘇條約》中有關蘇聯在東北權益認定的差異，也涉及蘇美兩國對重劃戰後東北亞勢力範圍區的認知不一。易言之，按蘇聯的角度，中國的東北接收只是戰後遠東國際秩序重建的一環，與外蒙古獨立，以及蘇聯可分佔日本、美蘇共同託管朝鮮半島等其他協議內容密不可分。

但相較於蘇聯雖比美軍更早進駐朝鮮半島，[26]但仍遵守兩國分治朝鮮半島的約定，並未侵犯美國在朝鮮半島南部的權益，[27]反觀美國卻無意履行蘇聯得以進駐日本北海道的原有計畫。也就是說，按美蘇兩國於戰前的協議，戰後的日本應劃分爲四個佔領區：北邊的北海道以及日本東北地區，由蘇聯軍隊進駐，南邊的四國島以及本州中的近畿地區，由中國軍隊負責，西南邊的九州島及本州的中國地區是英軍管轄區。[28]然爾後事實的演變結果，卻是 8 月 8 日蘇聯的參戰，雖讓蘇軍按原定計畫順利進佔中國東北，但進軍日本的計畫，卻只到進佔千島群島，就因日本全面投降，而沒有機會再南下至北海道。不過，從 1945 年 8 月 16 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翌日，史達林就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蘇聯有權派兵進駐北海道。[29]此外，蘇聯政府還特於 1945 年 9 月 24 日，利用在倫敦中美英蘇法五國外交部長所召開的大會中，呼籲應結束美國單獨對日本的統治，而改由蘇、美、中、英四國共管日本，但此一提案被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Byrnes）反對，而不得在大會討論後，[30]蘇聯政府於 1945 年 10

26 蘇軍早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前，就於 8 月 12 日開始向朝鮮半島北境進軍，而美軍卻遲至 9 月 8 日才在朝鮮半島南部登陸。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4，頁 377、393。

27 沈志華，〈三八線的由來及其歷史作用〉，《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北京：九州出版，2013），頁 5-8。

28 五百旗頭眞，《米國の日本占領政策》（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3），下冊，頁 216-218。

2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Vol. 6, pp. 667-668.

30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上冊，頁 735。

月 1 日又正式行文美國國務院，依然堅持共管日本。[31]由這些事例，可知蘇聯將美國拒絕其派兵進駐北海道，視爲背約。爲求反制，一面橫加阻擾國軍接收東北，一面又對中共大開方便之門，讓關內共軍大量湧進東北，就成爲蘇聯的新遠東政策。

從蘇聯面對美國獨霸日本，而以阻撓國軍接收東北，並順勢在東北扶植中共作爲反制，就可知東北的國共鬥爭，不能只從國共兩黨對峙的視角爲出發點，因其不僅牽涉戰後國共兩黨的布局，也與美蘇兩國的遠東政策密不可分。尤其美蘇的態度反而成爲東北接收走向的關鍵要素時，一部東北接收史，亦是一部國共兩黨與美蘇兩國共同介入，四方勢力較勁、相互牽制的互動史。是以，若欲掌握此一四方勢力較勁的演變脈絡，得先追溯美蘇兩國的遠東政策，特別是戰爭期間對國共內鬥所採取的政策著手。

美國介入國共內鬥，始於 1944 年 4 月日軍所發動的一號作戰（亦即中方所稱豫湘桂會戰）期間。是時，日軍先在河南發動猛烈攻勢，然後沿粵漢鐵路及湘桂鐵路引兵南下，兵鋒直抵距貴陽只剩 120 公里的獨山。重慶爲之震動，也牽動了中美之間的關係。

美國政府認爲國軍無法有效抗敵，關鍵在於國共兩黨相互牽制，導致國軍的戰略布置失當以及前線士兵士氣不振。爲求有效抗敵起見，美國政府希望能將共軍納入盟軍的作戰體系，並要求蔣介石將指揮全部中國軍隊的權力授予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將軍。

幾經波折，由於蔣介石的全力杯葛，美方的構想終告打消。史迪威尤因蔣的抗議而被強制召回美國。[32]不過，先前已進行的前置作業，例如爲求整編共軍而於 1944 年 7 月留駐延安的美軍觀察團，並未因合作計畫中止而被解散。[33]

---

3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Vol. 6, pp. 729-730.

32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445-518。

33 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頁 36。

美軍觀察團能持續保留，不僅反映美國與中共皆樂意維繫正式溝通管道，亦代表雙方皆認爲維持友好關係是符合彼此利益的。對美國政府而言，觀察團的存在意義除了象徵美國與中共樂意開展合作關係以外，亦是美國可精確掌握中共最新動態的觀察站。尤其是來自國務院的謝偉思（John S. Service）及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兩位成員，他們對延安的觀察及對國務院的建言，也使得美國政府內部一直有一股應重視中共，亦應重新檢驗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浪。除了認爲中共控制廣大農村，並得到華北及華中敵後民眾的支持是他們的主軸論述之外，也肯定中共的戰鬥實力，認爲是一支年輕、歷經戰鬥鍛鍊、受過良好訓練、素質極好、士氣旺盛的抗日生力軍。[34]在這些認知的基礎上，他們反對美國政府只單方面地支持國民黨，認爲這種援華政策，不僅無助於中國的民主發展，更會成爲助長蔣介石以武力作爲解決國共矛盾的企圖。他們強調擁有群眾基礎的中共，絕不可能被武力消滅。[35]故唯有美國強勢介入，逼使國民黨願與中共合組聯合政府的方式，才有望解決國共矛盾。[36]

將國共能否和解的關鍵，視爲美國能否成功逼使蔣介石願主動釋出善意，作更多讓步的主張，顯然與當時擬接任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的看法不同。赫爾利將雙方和解的障礙，歸咎於蘇聯的態度，認爲若蘇聯不從中作梗，則中共在後援無以爲繼的情況下，自然不會抗拒妥協。[37]

不過，上述雙方的差異僅在於對消除國共和解障礙方式的認知不同，對於中共實力之強已不容小覷的看法則不僅一致，[38]對國共和談的必要性，更是有

---

34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卷上，頁 240-241。

3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p. 566-567.

36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p. 197-199.

37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p. 198-199.

38 按中共的資料，首先，八路軍已發展成 60 萬主力軍，而新四軍也已擴展成 26 萬的主力軍。復次，中共在華北、華中、華南抗日戰爭的敵後三大戰場，也陸續建立 18 個解放區，再加上原有的陝、甘、寧邊區，總面積已達 95.6 萬餘平方公里，達淪陷區 144 萬餘平方公里中的 66%。其 19 個解放區中，中共轄區住民也有 9,550 萬餘人，約佔全國總人口 20%。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頁 218-219。

志一同。在雙方這種高度共識之下，如何早日促進國共和解，便成爲國務院的首要對華政策。[39]

1945 年 8 月 29 日，在毛澤東同意參與下，旨在促進國共兩黨和解的重慶會談得以開展。有鑑於毛澤東係搭乘美國專機，由赫爾利親自陪同赴重慶與會的事實，此次會談得以順利揭幕，美國自認居功厥偉，代表赫爾利自 1944 年 9 月來華擔任調解任務初步有成。[40]

不過，倘若進一步探究毛澤東欣然赴會的過程，自可發覺，蘇聯暗中施壓，亦發揮了臨門一腳之功效。按毛澤東於 8 月 14 日接獲蔣介石邀約，起初的反應是：蔣介石必須先正面回應共軍參加受降及成立聯合政府等訴求，才會「考慮會見的問題」。而毛澤東之所以在僵持 10 天後放棄了堅持，對會談的態度由「婉拒」而轉爲「首肯」，其實是因爲接到了史達林以俄共中央名義要求他赴會的電報。[41]

從上述重慶會談的召開經緯，在在證實一部國共內鬥史，亦是一部美蘇兩大霸權在中國的競逐史。是以，中國局勢演變情勢，除取決國共兩黨態度外，美蘇兩國政府對華政策實亦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對美國而言，其對華的基本政策是希望國共合作，促使中國「強大、統一、民主」，並成爲一個親美的安定力量。[42]惟對不欲美國獨攬中國利益的蘇聯來說，則希望另扶植中共以謀抗衡。不過，蘇聯當時的對華政策主要考量爲，與英、法、美等國爭奪東歐控制權，自不希望在中國另生枝節，故要求毛澤東參與和談，以避免立即爆發全面內戰。[43]

---

39 American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by Department of States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March 2, 1945, U. S. National Archives, 893.00/3-145.

40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頁 47-66；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4，頁 319-323。

41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5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 524-525。

42 王成勉，〈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一階段之研究〉，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2），頁 761。

43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433。

美蘇兩國既熱衷促成國共和解，皆致力促成國共兩黨能按他們所願參與會談。就蔣介石而言，《中蘇條約》的簽訂，讓他深信中共的外援已斷，因而他認為此刻將是逼使中共就範的最好時機。[44]這亦是他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獲悉條約已得以順利簽定的當日，就欣然接受美國大使赫爾利的建議，即刻以電報邀請毛澤東來商議和解之緣由。[45]然除了上述時機有利於國府的主觀判斷以外，眾多現實的顧忌，也讓國府沒有向美國說「不」的條件。例如抗戰勝利後，國府眼下面臨最大挑戰，是如何順利接收淪陷區。以當時國府的主力部隊大都遠在西南、西北，調動費時，華北、華東為日軍的主要佔領區，亦為共軍的聚集地，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都市均較國府為近，中共處地利上之優勢。是故，當蔣表達願配合美國的和解政策後，美國亦表達願提供下列援助。首先，美國不僅同意派遣美軍陸戰隊登陸青島、塘沽、秦皇島等地，還幫助國府接管華北地區投降之日軍，並肩負上述港口及北平、天津機場之安全。此外，美國還協助自大西南地區運送國軍至華北、華東等地以及延長抗日戰爭期間的租借援助。[46]

而對毛澤東而言，《中蘇條約》的簽訂，以及史達林要求他赴重慶和談，並表示若仍執意內戰，將會帶給「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等等的施壓，[47]皆顯示支持蔣介石繼續執政以及尊重美國可享有重整中國國內秩序的主導權，已成為蘇聯政府的既定對華政策。當反對國共內戰再起，已成為美蘇兩國的共識之際，若中共仍堅持武裝革命政策，不僅得不到蘇聯的支持，甚至可能還會遭遇美國的直接軍事反制。[48]

44　蔣介石對於國民黨已可掌握全局，而蘇聯已對毛澤東棄守之判斷，可從他對當時局勢描繪的日記中得到旁證。例如他於 8 月 28 日，對新華日報刊載〈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宣言〉，所提出承認中共統治區與軍隊劃定區由中共軍隊受降等等要求時，特在日記中曰：「新華日報於今晨發表其中共廿五日之宣言六項，仍彈舊套，似其實未知最近國際內容與情勢之發展，而更未知中蘇協定之內容，可憐極矣，彼猶不知早為蘇俄所遺棄矣。」《蔣介石日記》，1945 年 8 月 28 日。

45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頁 111。

46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42-443。

4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13。

48　牛軍，〈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蘇國共關係〉，《歷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85-89。

面對此一嚴峻的外在情勢，毛澤東除了一改原來拒絕和談的態度以外，更利用黨內於 8 月 23 日所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將原本「抗戰、團結、進步」的處理國政口號，改提爲「和平、民主、團結」。對於他爲何要參與重慶和談以及調整黨內的路線與策略，他也在會議上作了以下的說明：

> 和平是能取得的，因為蘇美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內戰；中國人民需要和平。國民黨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為它的攤子未擺好，兵力分散，內部矛盾，無論如何弱於日軍加偽軍，加上解放區的存在，我們不易消滅，人民與國際反對內戰，因此內戰是可以避免與必須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是有現實基礎的。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他所以可能採取暫時的和平，是由於有上述諸條件，以便醫好自己的創傷，壯大自己的力量，將來等待機會消滅我們。關於承認解放區、解放軍的爭論，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讓步。[49]

從以上陳述可知，毛澤東並不諱言，他之所以要參與和談，是受國內外情勢所逼。在這種國內外皆期盼和平的氛圍情勢之下，不僅他個人難以拒絕，連蔣介石也難以抗拒。也由於他認爲促成國共和談得以展開的動力是來自於外在壓力，因而除了明確指出蔣的求和誠意不可盡信以外，並應將保留解放區的現狀視爲不可妥協的底線。強調爲堅守此一底線，必要時應不惜以武力抗爭，但此一抗爭又以不會全面決裂爲度。

（三）同盟體制假象下國、共、美、蘇四方的互動

從重慶會談得以展開之經緯來看，除了國共兩黨的本身意願以外，決定國共關係走向和平協商抑或武力抗爭，美蘇兩國的態度亦是重點。易言之，重慶會談雖由美國一手促成，但蘇聯不反對也是重要關鍵。也是因得利於戰後初期，蘇聯希望在亞洲仍能維繫美蘇同盟體制，故寧願選擇要中共低調，凡事先

[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頁 10-11。

以厚植實力迴避武力衝突爲要的對華政策，才讓戰後初期，國共兩黨願意走上談判桌，嘗試以和談的方式，探索雙方和解的可能性。

國共和談既然是在美蘇同盟體制下，國、共、美、蘇四方勢力經過相互角力，協商才得以成局，而掌握戰後初期對同盟體制下四方勢力的基本立場及爾後的發展，自然是探索國共和解何以破局、同盟體制何以瓦解的最佳線索。

戰後初期蘇聯的對華政策，則可分爲國防線及利益折衝線兩個不同層面的追求。前者是確保對東北的港口及鐵路的控制，[50]使東北與外蒙古、庫頁島與千島群島連結起來，形成一道國防安全堤，能充分保障蘇聯免於來自日本海及太平洋的外來勢力入侵。[51]後者則是在鞏固前面的基礎上，再盡量擴大在中國東北的廣大政治及經濟權益。易言之，鞏固國防線是蘇聯對華政策的不容妥協底線，而在利益折衝線方面，則是保持彈性，完全視當時現實環境演變而定。尤其是中國國內國共兩黨勢力的消長，以及美國支持國府的力度，則是蘇聯決定對華政策走向的兩大考慮要素。

親蘇聯英美是蔣介石在戰後初期擬推動對外政策的大要，尤其是確保蘇聯不染指東北、新疆，以及不支援中共，是他戮力最深之處。蔣介石的所見所聞，可參照其於 1945 年 7 月 28 日，戰爭結束前夕所撰寫的〈對國際形勢與今後政策之研究〉。研究心得中，他首先分析《中蘇條約》簽訂的得失，他認爲蘇聯之所以執意要外蒙古及旅順，一是爲了鞏固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基地，二是爲了牽制中國的親美政策。[52]換言之，在蘇聯已將美國視爲首要假想敵之際，如果中國不能滿足蘇聯要求，蘇聯必會不擇手段打擊中國，甚至在滿蒙邊境收容中共，製造傀儡政權，以分裂中國。反之，假若中國放棄外蒙、旅順，滿足蘇聯的國防需要，蘇聯爲了維護中國的中立地位，不讓中國一面倒向美國，自會遵守諾言。是以，蔣介石認爲在中國無力與蘇聯作戰的現實環境下，與蘇聯簽約

---

5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Vol. 7, p. 1232.

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 929.

52 王正華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11），卷 61，頁 627-636。

反而是較理性的選擇。再者，至少可爲中國爭取二、三年之時間來鞏固統一，奠定建設基礎。中國若能及時培養實力，蘇聯自是不致違背前約。易言之，他認爲只要國府對蘇聯維繫一定程度的善意，蘇聯政府爲防止國府投靠美國，就不會在東北及新疆問題上爲難國府。[53]

支持國府成爲一個協助美國維繫戰後遠東新秩序的重鎮，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秉持對華政策的基本立場。然在深知貧窮及動盪是製造共產主義興起的溫床前提下，鼓勵國共和談，希望中國能早日擺脫內戰陰影，全力復員、發展經濟，則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內涵。[54]特別是 1945 年 8 月以後，蘇聯軍隊已有效控制中國東北、內蒙古，故在蘇聯扶植下，另在東北、內蒙古、華北建立親蘇共產政權，並非毫無可能。[55]爲了防止分裂、避免內戰，如何早日促進國共和解，藉由中共結束體制外的武裝鬥爭，使中國的政治能朝向穩定及民主的機制發展的同時，亦能讓國府的管轄範圍擴展至全國的兩大目標，進而就成爲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軸。[56]是以，抗戰一結束，美國政府就藉由不同的形式，積極爲國共和談鋪路，赫爾利所主導的重慶會談，以及馬歇爾的調處，其原點皆是來自於此一思維。至於對東北，美國雖承認蘇聯在港口及鐵路上所享有的特殊權益，但亦堅持東北也應適用於門戶開放原則，不允許東北成爲蘇聯獨霸的勢力範圍區。[57]

承認大勢不可違，中共只能伺機而動，是毛澤東所持的基本立場。尤其是維繫國府的執政地位，已是美蘇兩國共識之際，如何不要挑戰美蘇兩國的底線，避免爲美軍製造直接介入國共內戰的機會自是首要考量，如何在既有的國

---

53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370。

5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945: Jul-Dec)*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 Vol. 13, p. 945.

55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 Discussing of United Stated Policy with Respect Thereto, Nov. 16, 1945, U. S. National Archives, 893.00/11-1645.

5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Letter of Transmittal”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uly 30,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 XI.

57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頁 137-138。

際秩序架構下，創造黨與黨之間的合作空間，則是他在進軍東北政策上所採取的新戰略。

基於此一認知，毛澤東堅信蘇聯雖因簽訂《中蘇條約》，對國府的東北接收，有不得抗拒的外交義務，但此一義務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原本壁壘分明的界線。在國共兩黨分別代表美蘇兩國在中國境內的陣營之際，中共在國共內鬥中的失敗，也等同於蘇聯在美蘇鬥爭中的失敗。是以，在東北接收問題上，毛深信只要不影響蘇聯的公開義務，中共與蘇聯之間，絕對有合作的空間。[58]

在此一信念下，就在毛澤東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翌日，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劉少奇根據書記處會議的決定，發出了如下指示：一、蘇聯為了維護遠東和平與受《中蘇條約》限制，必需將東北交還國府，我黨我軍進入東北後，紅軍必不肯與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幫助。二、但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我黨我軍在東北之各種活動只要不直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取放任態度。三、晉察冀和山東準備派到東北之部隊與幹部，應即出發，可用東北軍及義勇軍名義進入，不要聲張不要在報社上發表消息，可走小路，控制廣大鄉村和紅軍未曾駐紮之中小城市等等。[59]

當中共願在不違背《中蘇條約》的規定下，爭取蘇聯合作的態度，自然也讓蘇聯有更多的空間操縱兩面外交。這也是 9 月 2 日，冀東 16 分區司令曾克林率部進入瀋陽，與蘇軍進行交涉後，蘇方就同意八路軍先以「東北人民自治軍」的名義展開工作。隨即 9 月 15 日東北蘇軍總指揮部派代表在曾克林陪同下到達延安，雙方也針對合作方式，達成初步協議。首先，蘇軍同意將熱遼原屬於中共抗日根據地地區，全部交由中共接管。復次，凡配戴「東北人民自治軍」標誌的中共部隊，可自由行動。[60]

---

58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頁 463。

59 〈中央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9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冊 15，頁 257-258。

60 牛軍，〈戰後初期美蘇國共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鬥爭〉，《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頁 223-225。

從上述四方勢力對中國局勢所持的基本態度，就可知戰後中國政局，不僅是國共兩黨的統治權之爭，亦是美蘇兩國全球戰略布局的一環。至於美國所熱心推動的重慶會談，由於蔣介石、毛澤東皆視重慶會談場外的外交爲核心問題，會談場內的交涉當然只是虛應故事。1945 年 10 月 10 日，在經過蔣、毛 8 次見面、雙方代表經歷 42 天的談判，重慶會談以國共雙方簽訂《會談紀要》的方式，宣布閉幕。然而，雙方雖在兩黨共同遵循團結建國、避免內戰，以及召開由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等原則性問題達成協議，惟一旦涉及「軍隊國家化」及中共能否維持「解放區」的獨立發展等實質性議題上，陷入了各說各話，只能留下再商議的初步結論。[61]因之，蔣介石堅持貫徹統一國家的軍事、政令，毛澤東則擺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姿態，凡是中共所擁的一槍一彈以及所佔據的每寸土地，皆不願且不能交出。[62]

國共雙方對如何控管軍事武力等核心議題，既然無法達成協議；運用手中武裝勢力加緊接收淪陷區，擴大勢力範圍，遂成爲兩方的較勁目標。進駐華北，接收東北是前者的戰略目標；控制華北，獨佔東北卻是後者的目標。上黨與邯鄲的兩次戰役，則是雙方於抗戰結束後，分別在山西及河北省界內兩次短兵接觸的結果。上黨與邯鄲的軍事衝突，以國軍全面潰敗收場。影響所及，讓中共「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政策取得初步成功，得以將華北與東北的控制區連成一片，讓大批從陸路搶進東北的中共武裝部隊，順利經由察哈爾省及熱河省一路暢通地進入東北。[63]

相較於中共的部隊得以從陸路源源不斷地進入東北，而國軍本欲從海陸兩路派遣 5 個軍進駐東北的計畫卻無法開展。前者的 2 個軍是因被中共橫阻於豫北，後者的 3 個軍是因蘇聯不配合而無法落實。[64]尤其是當大連確定無法登陸以後，國府只得重新調整接收東北計畫。

6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713-714。

62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頁 466。

63 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頁 25-26。

64 〈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有關東北接收情形報告〉，收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冊 1，頁 216。

10 月 13 日原擬派赴大連登陸的第 13 軍及 94 軍改由秦皇島登陸，爾後再藉由陸路出關，是新計畫的第一步。[65]開始布署葫蘆島及營口登陸，以及與蘇聯開始研商空運部隊至瀋陽及長春的可能性，則是第二步。當時中蘇雙方交涉困難的癥結所在，尤其與時局變遷互動關係之密切，可參照 11 月 6 日駐守長春的外交特派員蔣經國致蔣介石的報告，蔣曰：

> 與馬林諾夫斯基及其他人員之談話中，可知東北局勢之變化，係受美蘇關係及中央與共黨衝突之影響，蘇方恐我國軍隊進入東三省後，將支持美國在東北之利益，甚至未來戰爭中，我軍有被美國所用之可能，故不願我國大軍開入東北。但根據條約，蘇方不得不撤兵，同時亦無法禁止我軍開入東北，故決定造成混亂局面，使我中央一時不能順利接收東北，此乃蘇聯最近一切設施之主要原則。馬氏曾屢次作對美國不滿之表示，並在語氣中常含有中國不應過於依靠美國之意。最近以來，馬氏常問中央與中共談判情形，並認為中國發生內戰，乃一最大之憾事。[66]

中蘇同盟體制假象下的爾虞我詐，可藉這份報告一覽無遺，但對無軍事實力挑戰強權的國府而言，只能在此一假象下，力求妥協。然局勢的演變，讓即使要維持假象，也有所不能。按蘇軍最高指揮官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於 10 月 15 日所知會的撤軍計畫，蘇軍分三期撤完，第一期預定至 10 月 20 日撤至瀋陽線，第二期 11 月 25 日撤至哈爾濱線，第三期 12 月 1 日，全面撤回蘇聯國境。[67]因而當 10 月 29 日國府正式知會蘇軍，將藉助美軍軍艦改在葫蘆島及營口登陸時，蘇軍的答覆卻是營口登陸可絕對保證安全，但不能保證葫蘆島。然更令人氣結的是，11 月 1 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通知外交部，因蘇軍北撤的緣故，

65 〈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有關東北接收情形報告〉，收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頁 216。

66 蔡盛琦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12），卷 63，頁 430-431。

67 〈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有關東北接收情形報告〉，收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冊 1，頁 215。

現營口已被來歷不明之武裝部隊佔領。[68]

所稱來歷不明，無非是蘇軍掩耳盜鈴之說法，事實上營口已被共軍所佔，而美國又不願與共軍衝突，故原訂讓美軍護送國軍在營口登陸的計畫，只得被逼放棄。至於擬借用空中運輸管道，派先遣部隊先赴瀋陽、長春參與接收業務的交涉，所得的答覆卻是可自 11 月 17 日及 20 日，各派 1 架至兩城市降落。[69]然據身在長春行營的蔣經國觀測，早在 11 月 12 日，蘇聯就已允許 2,500 名的共軍進據長春。[70]至於蘇聯一再促行營應加速接收步驟，尤其是針對長春鐵道及電信事務，「用意似在推諉責任也」。[71]易言之，蘇聯的所作所為，全然是表面功夫，故意讓東北接收有名無實。是以，在陸、海路進軍東北皆面臨受阻之際，「先安關內，再圖關外」便成為蔣介石的新抗敵方針。[72]

1945 年 11 月 17 日，蔣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指責蘇聯政府無視中蘇協定條文，初則拒絕中國軍隊在大連登陸，繼則使共軍佔領營口、葫蘆島等港口，最後還讓共軍佔領長春。[73]為此，蔣介石決定將預定接收東北的 5 個軍，全部固守華北，並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作為改弦更張後的新對策。[74]

三、東北接收失控之始末

然對美蘇兩國而言，若蔣真的棄守東北，不僅會影響國共和解的發展走向，也是對既有遠東國際秩序的一大挑戰。對於情勢的驟變，除了美國不會置之不理以外，連蘇聯也將此視為難以承擔之重。故如何勸阻蔣收回前議，不讓

68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頁 157-159。
69 蔡盛琦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卷 63，頁 485。
70 蔣經國，〈五百零四小時〉（1945 年 11 月 12 日），收入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冊 1，頁 322。
71 蔣經國，〈五百零四小時〉（1945 年 11 月 13 日），收入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冊 1，頁 322-323。　。
72 蔡盛琦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卷 63，頁 556。
73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 8，頁 238。
74 蔡盛琦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卷 63，頁 556。

東北情勢失控，尤其是如何避免中國問題成爲美蘇交惡的新議題，自然就成爲美蘇兩國重新再調整雙方遠東政策的新契機。

對於蘇聯政府在東北接收問題上所採取的陽奉陰違策略，美國政府不是不知，尤其是蘇聯在表面上雖宣稱遵守《中蘇條約》，要將東北的主權移交給國府，然暗地中卻利用控制張家口、山海關、古北口等要地之便，[75]將在這些地區所擄獲的日軍武器，陸續轉贈給中共，讓共軍不僅可利用這些交通要道，得有可搶先出關之便外，更因得有蘇軍額外的武器補給之利，讓其戰鬥實力頓時倍增等事例，早已藉由美國在華的領事報告，鉅細靡遺地傳達到美國國務院。

蘇聯在東北問題上的戮力之深，對中共協助之大，更可從其協助中共部隊入駐東北數量的快速成長得到見證。根據美國駐華領事館的報告，1945 年 9 月 29 日止，雖只有 3,000 人的中共部隊進駐瀋陽，[76]而到 12 月 3 日時卻已增爲兩萬人。[77]至於全東北，11 月 28 日的報告，估計出關的部隊是 10 萬人，[78]12 月 3 日的報告卻被認定爲已擴增到 28 萬人。[79]

面對蘇聯在東北問題上的兩手策略，尤其是蘇聯對中共的暗中相助，美國雖知無法全面杜絕，但仍期盼藉由外交談判以及調停國共衝突，以求蘇聯不可再明擋國府的接收，也期許國府可因國共和解有成而不需再瞻前顧後。

以前者言，最具體的例證，莫過於 1945 年 12 月 27 日，美英蘇三國外長共同聯名發表的莫斯科會議宣言。[80]在該會議中，三國不僅重新確認將繼續維

7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p. 572-573; 578-579.

7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p. 572-573.

7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p. 487.

7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p. 687.

7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p. 692.

8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Gene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tter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Vol. 2, pp. 815-824.

繫同盟體制的運作，並對如何與義大利等戰敗國簽訂和平條約及針對中、日、韓三國的戰後處理也得出新的結論。[81]關於中國部分，三國除重申將堅持不干涉中國內政以外，也期許在國府的主政下能終止內戰，建立一個統一、民主的聯合政府。對於美蘇兩國在中國東北及華北地區駐軍，兩國政府也皆共同宣示無意長期逗留，在各自完成對國府的應盡義務以後，將盡速撤離。

以後者言，美國杜魯門總統（Harry Truman）除特於 11 月 27 日任命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爲駐華特使以外，並於 12 月 15 日在馬歇爾啓程赴任的同日，發表對華政策聲明，謂「美國暨所有聯合國家咸認中國應竭力迅速依和平協商方法調整內部爭議，美政府相信下列兩點至關重要：（一）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見不合之軍隊，應協商停止敵對活動，俾中國全境得以重歸中國之有效控制，日本軍隊亦得迅速撤退。（二）召開一全國主要政黨代表會議，以謀早日解決目前之內爭，俾中國統一得告實現。」[82]

（一）馬歇爾使華與東北接收的新格局

從上述杜魯門的對華政策聲明以及接著而來的莫斯科宣言，可知美蘇兩國除了再確認原有的共識以外，也各自再度調整雙方的遠東政策。以前者而言，首先雙方皆同意在國民黨主政基礎上，謀求國共和解，並協助國府擴大其統治基礎。復次，雙方皆同意盡速撤退在中國的駐軍。以後者而言，美國政府同意以成立「對日理事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方式，提升蘇聯在盟軍佔領日本事務上的監督地位，[83]以換取蘇聯政府對美國政府介入國共和談的支持。

---

81 二次大戰期間，歐洲因與德國結同盟關係而淪爲戰敗國者，共計有 5 國，分別爲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等國。至於針對日本，大會得出將由 11 個曾參與對日作戰的同盟國，在華盛頓成立「遠東委會員」（Far Eastern Commission），統籌盟軍統治日本事宜。遠東委會員採合議制，爲代表盟國處理日本的最高權力機構。至於韓國，爲求南北韓的統一及民主發展，首先美蘇兩國在該地的駐軍當局應成立一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負責協調兩國在南北韓的善後業務。復次，再成立一爲期 5 年的托管委員會，由中、美、英、蘇四國合組而成，負責監督美蘇兩國在南北韓所推動的扶植韓國統一獨立計畫。

82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冊 3，頁 48。

83 「對日理事會」由中、美、英、蘇四國合組而成，隸屬於遠東委員會，爲駐日盟軍的諮詢機構。

蓋國共和談的標的，既然是以維繫國民黨的繼續執政爲前提，維護國府作爲主權政府的既有形象，特別是支持國府代表國家主權執行收復失土的東北接收行動，自是表態認同國民黨作爲中國執政黨的所有同盟國應盡之義務。易言之，當蘇聯還無意與美國全面決裂，還同意繼續維繫自雅爾達會議以來的合作體制之際，自然不便再公然阻攔國軍接收東北，對美軍欲提供運輸工具協助國軍登陸東北，也不便再公然抗拒。

此一新情勢所帶給東北接收行動最具體的變化，莫過於 12 月上旬蘇聯政府開始主動驅逐長春、瀋陽等城市的中共駐軍，[84]並同意國軍可利用長春及瀋陽的機場外，也可在東北的港口登陸以及使用北寧鐵路。而國府也因蘇聯的積極配合，首先於 1946 年 1 月上旬，將國軍空運到長春、瀋陽兩地，並順利完成兩市的接收。復次，也於 1 月 3 日發電報給美軍駐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要求美軍提供艦艇協助國軍於 1 月 12 日之前登陸葫蘆島。[85]

蓋駐華美軍原本的任務，限定於協助國軍接收淪陷區及負責遣送日僑，因此戰後曾將約 50 萬的國軍護送至華東及華北地區的各大都市。[86]但因美軍需嚴守不得捲入國共內鬥的軍令，故 1945 年 11 月 2 日中共軍隊進入營口並對美國海軍駐營口前哨站展開砲擊示威時，美國海軍爲避免衝突，除即刻從營口撤離，[87]也於同月 30 日，開始停止運送國軍至華北的支援活動。[88]

但在馬歇爾的主導下，駐華北美軍司令部所以同意恢復輸送國軍的支援計畫，並不是美軍今後將捲入國共內鬥，而是美國將國軍接收東北，視爲執行國家主權之必要行爲，與國共政爭無關之故。也因得力於此一新解讀，亦讓馬歇爾在他籌劃停戰令草案和一項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具體計畫中，規定國軍向

84 〈蔣中正日記〉，1945 年 12 月 8 日。
85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 8，頁 273-274。
8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 pp. 311-312.
87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58), pp. 344-349.
88 〈蔣中正日記〉，1945 年 11 月 30 日。

東北調動，應視爲中國收復東北主權之必要行爲，不隸屬國共雙方軍隊皆停止調動的規定之內。[89]對於美國的提議，中共本持強烈抗議態度，堅持東北應與關內一視同仁，並希望得到蘇聯的聲援，開放蘇聯參與東北問題的談判，以保全中共在東北的利益。中共的設想，因未獲蘇聯支持，只好放棄。[90]爾後，中共在確保赤峰及多倫兩地的控制權後，與馬歇爾達成協議。國共雙方的停火協定，也因突破此一僵局，而得於 1946 年 1 月 10 日正式宣布實施。[91]

有鑑於國軍接收東北的原有障礙，皆已一一解除，蔣介石亦一改稍早的「先安關內，再圖關外」政策，決定「先圖關外」。因此，蔣介石除原預定接收東北的 5 個軍以外，臨時決定再加配 5 個軍，以總計 300,000 的精銳部隊投入東北。[92]其中有 7 個軍，228,000 人係仰賴美國海軍運輸，從華南地區運至東北各港口登陸。[93]

按蔣介石的認知，他認爲國共內戰失敗的關鍵，由於他不能堅持己見，誤聽馬歇爾建言，貿然接收東北之故。例如他於 1951 年 10 月 25 日回顧此過程時，特意在日記記述稱：

> 如果我於 34（1945）年 11 月決定撤回長春行營以後，明知自力不足，不能接收東北之政策，不因以後美國助運我軍接收東北，以為可恃，而堅拒接收，一任俄國之霸占，將我國軍全力先行肅清關內之共匪，則決不致如今日之失敗，此乃依賴外力轉變政策，決心不堅之報應。一著既失，則全盤皆敗矣。[94]

8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Vol. 9, pp. 4-6; 755-756.

9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9, pp. 17-21.

9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9, pp. 104-105; 126-127.

92 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頁 56。

9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9, p. 791.

94 〈蔣中正日記〉，1951 年 10 月 25 日。

然而從此事後自省的文字，反而更能證明蔣介石是因得力於美國之助才能順利展開東北接收工程。但此一全面仰賴美國的選擇，亦代表蔣介石已自絕於戰後初期所擬推動的親蘇聯英美政策。而此一全面親美絕蘇政策的代價，尤其是與東北接收失控之間的關連，箇中癥結，還得從上述蔣毛兩人東北接收策略及美蘇兩國對華政策相互制約之間的四角互動關係中尋找解答線索。

以前者而言，國共兩黨所以願意參與和談，主要動機還是來自於外在壓力難拒，雙方實際上並無互信的基礎，即便經過重慶會談與政治協商會議，也沒有任何改變。因而如何利用和談爭取外援，伺機厚植勢力，反而成為兩黨面對和談的基本心態。1946 年 1 月 10 日，停戰協定得以成立，就是因此協定並未對各自今後軍事勢力的拓展有實質限制，尤其是對雙方急欲投入的東北地區，更為雙方預留可耕耘的空間。例如，在「停戰令」中，將接收東北視為中國收復失土的主權行為，此一軍事調度不應與國內國共內鬥掛鈎，故美軍運送國軍登陸東北各港口，並不觸犯美軍不得捲入國共內鬥的既定政策。但對同樣是蘇軍接收的赤峰及多倫，卻刻意讓其不適用於收復失土主權的條例，反而要求國府默許中共對兩地的實質控制，並將其歸為中共統治區。

針對馬歇爾在停戰令的布局，蔣介石的解讀是：「彼之見地全在近處要點做起，又注重今日之實際，而不重將來之變化與目前不急之遠大玄想，故彼對赤峰、多倫雖為戰略要點，亦棄之如遺。」[95]易言之，將國共兩黨願放下武器，同意停戰視為最終價值的馬歇爾，並不在意此等安排對今後兩黨在東北勢力消長的影響。對他而言，解決當前中國危機的唯一機會，是如何將國共兩黨對中國未來定位的走向，從向「右」或向「左」的爭議中，轉到向「錢」走。因為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雖嚴守不捲入國共內戰，但卻樂於對一個朝向民主、統一發展的中國伸出援手。因而只要停戰一成立，他就有信心讓美援源源而來。而只要國共兩黨有機會投入實體的建設工作，新的發展契機也必定會有效緩和

95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1 月 9 日。

兩黨長期對峙的緊張情勢，爲共組聯合政府奠定基礎，從而帶來中國的安定與繁榮。

（二）國共兩黨對東北接收的基本態度

然對長期處於抗爭關係的國共兩黨而言，仍將如何保存並擴大自身武裝力量，視爲維持自我生存最佳保障。因而停戰協定反映到東北接收的實際層面，就是國府利用美國軍艦大張旗鼓向東北輸送軍隊的同時，中共也靜悄悄地不斷將軍隊藉由赤峰等陸路送進東北。1946 年 3 月中旬，中共入駐東北的部隊已達 341,200 人，[96]同時期國軍入駐東北的部隊卻只有 137,000 人。[97]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於 1946 年年初親自致函史達林，希望蘇聯能將目前在莫斯科工作而具有東北出身背景的中共黨員，儘速送回東北的滿州里、齊齊哈爾、哈爾濱等地，以便與中共中央北滿地下機關接軌，[98]幫助中共將蘇聯在遼寧、松江、安東、吉林、渾江和哈爾濱等 100 多個地區建立的臨時人民委員會，[99]早日納爲已用。

於是「關內停戰，關外搶進」成爲國共和談生效後第一奇特之現象。從國共兩黨的東北政策，亦可看出雙方的應對，皆須配合遠東的國際形勢。例如蔣原欲放棄東北，但美國卻不願將東北拱手讓予蘇聯，故鼓勵蔣進軍東北。而蘇聯亦怕全面抗拒國軍進入東北，反倒爲美國製造可直接介入東北的藉口，故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量下，最後選擇重開大門，讓蔣的勢力得以入駐。

對於蘇聯從未放棄扶植中共，並將壯大中共作爲反制美國對華政策一環之事，馬歇爾不是不知，中共也因得力於蘇聯的大力協助，得以讓大批部隊湧進東北，他更是心知肚明。但鑑於自雅爾達會議以來到莫斯科會議止，承認蘇聯

---

96 呂迅，《大棋局的國共關係》，頁 166。

97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 147.

98 〈毛澤東致史達林電：匯報中共的情況〉（1946 年 1 月 7 日），收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945.1-1949.2）》（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卷 1，頁 121-122。

99 〈格緬德爾致科瓦廖夫報告：滿州政治局勢尖銳化的原因〉（1946 年 5 月 8 日），收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945.1-1949.2）》，卷 1，頁 150。

在東北享有特殊權益已是美、蘇、英三國的長期共識，在美國不能因東北事務與蘇聯發生直接衝突，以及不能捲入國共內鬥的基本前提下，使得他唯有落實國共兩黨的和談，才有希望掌握主導權，並藉此與蘇聯暗地扶植中共政策抗衡。

按當時即將接任駐美大使顧維鈞的觀測，馬歇爾所以看重停戰，因這是能爲中國爭取經濟援助的唯一機會。故國共和談的重點，不在於解決兩黨治國理念的差異，而是在於能否向美國政府及民眾，塑造出國府可以自行和平解決內部爭議的新形象。[100]但對蔣介石而言，東北原本就沒有中共的武裝勢力，故他並不願意將東北地區也納入停戰適用區。他的顧忌，誠如時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所言：「中央停戰令頒佈以後，我軍不能向有非法武力之地前往。所謂共軍（即軍事調處以前之非法武力）則可在蘇軍掩護之下，大事擴充，乘間抵隙，避實擊虛，鼠竊狗偷，爭城掠地。」[101]易言之，當中共在東北地區已享盡地利、人和之便時，還硬使東北地區與關內仍秉持同一基準處理，只會誘導更多的中共部隊湧入關外，除增添接收任務的複雜度以外，更會擴大兩黨在東北的爭議，可說是普遍反映當時國民黨人的心聲。在此一思維下，對國軍沿北寧路北上，並於 1 月 24 日在營口與中共短兵接戰時，無論馬歇爾或中共代表周恩來，皆盼爲執行停戰命令而在北平設立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以下簡稱軍調部），能即刻派員處理爭議，國府卻以美國軍方代表出現東北會引起蘇聯方面的無謂抵制，而不予理會。[102]

爲此，在馬歇爾的認知中，國共和談的破局，東北局勢的失控，國共兩黨皆難辭其咎。以前者而言，國府不願在第一時間內即讓軍調部到營口處理爭議，[103]可謂是破壞兩黨創建和平解決東北接收爭議機制的良機。以後者而言，

---

100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下略），《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分冊 5，頁 701-702。

101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 513。

102 王成勉，〈從和平到戰爭；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二階段之研究〉，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冊 3，頁 409-411。

103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Vol. I, pp. 55-56.

同年 4 月 18 日中共公然進攻長春，[104]並在四平集結大軍，力阻國軍北上。爲此，國共雙方在四平展開自戰後以來規模最大的陣地攻防戰，因共軍傷亡過大，主動撤離才結束戰鬥。此一戰鬥因是中共挑起之故，也讓國府內部頓時興起更多主張武力反制中共的聲浪，使得馬歇爾的調停計畫自此平白增添眾多阻礙。

對於東北也應納入停戰協定的規範區域，國府自始配合意願不高。例如蔣介石最終同意派遣軍調小組入東北的前提是「中央軍隊在東北行動不受限制」。[105]至於在東北負責軍事重任的熊式輝，更是直接表態反對軍調小組插手東北事宜，理由是：「東北接收，乃中蘇兩國根據條約相互交接問題，與關內不同；且三人小組來到東北調處，則依協定將熱河劃分境域之覆轍，東北九省除我軍所已接收及掃清之一部分外，其餘皆將名存實亡，勢必俱爲蘇軍一手分布之傀儡所謂非法武力所有。」[106]易言之，熊氏認爲馬歇爾爲求急速展現和平成果，凡事皆以承認現狀爲調處方式，自然有利於較國軍捷足先登的中共。中共不僅可藉此將廣大的農村收編爲其勢力範圍，也可使國軍的控制區域只限於北寧路上的少數南滿城市及靠空運而得以接收的長春等地。熊氏此語可謂充分反映國民黨人排斥軍調小組進入東北的心理。

至於中共方面，原本他們希望藉由調停，阻止國軍繼續北上，也盼能逼使國府承認中共已有 30 萬部隊進駐東北，並已廣設據點的既有事實。然當調停問題爭議延宕多時，尤其當蘇聯決定改變對國府政策後，也讓中共得以重新調整對東北調處的基本態度。

蘇中關係的突變，實與國府對蘇態度的改變有關。蓋蘇聯原冀望能在蘇軍從東北全面撤離之前，與國府簽訂共同經營日本留下龐大企業的經濟合作協定，不料當國府軍隊進入東北以後，蔣介石已決定放棄他在《中蘇條約》簽訂前夕，曾一度擬採取的親蘇聯英美政策，而改對蘇聯持排斥態度。他除了婉拒

---

104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Vol. I, p. 272.

105 《蔣介石日記》，1946 年 3 月 23 日。

106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518。

蘇聯於 5 月邀請他到莫斯科訪問以外，[107]對東北問題也堅持先完成東北接收再談經濟合作，使得雙方合辦企業之談判，一直沒有進展。[108]

爲了逼使國府能在中蘇合辦企業上滿足蘇聯的要求，蘇聯決定放寬對中共武鬥的限制，以求反制國府。蘇聯原本要求中共即刻從瀋陽、長春、哈爾濱等大都市及鐵路線上撤軍，不允許他們利用上述據點阻礙國軍北上進駐，[109]此刻則開始允許中共部隊可在南滿鐵路沿線重新集結，不反對中共以武力抗拒國軍繼續北上。[110]

對已擁有 30 萬雄兵的中共而言，原本就對無故交出地盤而百般不耐，此刻對蘇聯願放寬限制，自然是躍躍欲試。中共急欲一戰的心態，莫如毛澤東於 1946 年 3 月 17 日及 24 日，分別對東北負責軍政要務的彭眞、林彪、黃克誠、李富春等人所發的電報指令。前者是「瀋陽以北長春路沿線之蘇軍撤退區同意你們派兵進駐」，後者是「全力堅決控制四平街地區，如頑軍北進時，徹底殲滅之，決不讓其向長春前進」。[111]

（三）蔣馬兩人的觀測角度不一

當四平之戰皆被國共雙方視爲是爭取掌握東北戰略主動地位的樞紐之際，徵集重兵自是雙方面對四平戰役的基本態勢。以國民黨而言，將當時派遣到東北 7 個軍 21 個師中的 10 個師投入戰役，而中共方面，則是動員主力部隊 39 團中的 20 個團。[112]

四平戰役既然是國共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陣地戰，對此戰役的評價，自會成爲影響國共雙方以及美、蘇對中國情勢判斷的重要指標。其中最關鍵者，莫過於影響馬歇爾調停國共內鬥的走向。例如，蔣介石對國軍的卓越戰績是高

---

107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36。
10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720-731。
109 朱元石，〈劉少奇與抗戰結束後爭奪東北的鬥爭〉，《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頁 144。
110 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頁 234-235。
1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頁 62-63。
112 汪朝光，《和與戰的抉擇：戰後國民黨的東北決策》，頁 151-160。

度肯定，故特於 5 月 22 日的日記曰：「林逆彪之低能無智，殊生我意料之外也。」[113]而馬歇爾卻強調：「共軍死傷 1 萬 2 千，俘虜僅 400 餘人，如是共軍主力並未擊散，共軍現在避戰，如國軍跟蹤而進，則必延長戰線，予『共軍』以處處可以截擊之機會。」[114]

從上述兩人不同的反應，可知蔣爲戰略要地的取得而欣喜不已，而馬卻爲中共的主力部隊沒有受損而憂心忡忡。也因雙方對戰役觀測角度不一，也使得雙方對國共和談的必要性有不同的認知。蔣認爲國共內戰勝敗的樞紐在於東北，華北的動盪只是地方性質，只要能掌控東北主戰場，就可決定勝出。但馬則擔憂，東北局勢的失控，也會影響華北戰場的得失，尤其是中國漫長的交通線，以及邊境多山的地形，皆有利於中共發展游擊戰術的環境。[115]

也因馬歇爾不爲眼前的勝利所惑，故他仍秉持初衷，堅信和談還是最符合國民黨利益。爲此，他以去留相爭，逼使國府同意軍調小組進駐長春，並繼續與中共和談交涉。就在馬歇爾執意要求國府停戰，而中共也有意於四平大敗後爭取休養，故 6 月 6 日國共各自宣布停戰令。但從停戰令是各自頒發，而非如第一次停戰令是由三人會議議定來看，就知此次停戰令的基礎非常薄弱。雖在停戰期間，國共雙方也針對停戰、恢復交通與軍調小組的運作方式等議題，達成「三人會議終止東北衝突之訓令」、「恢復華北華中交通線指令」及「解決執行小組交通小組北平執行部及長春執行部中某些爭議之條款」等三項協議，但因蔣介石要求所有協議文件必須同時簽字，而被整軍協定中駐軍地點未能達成共識所牽累，導致原已獲協議的文件也都未能簽字。[116]

6 月 6 日的停戰於 6 月 30 日結束，停戰期間雙方沒有簽署任何協定，短兵相接的衝突場面也持續不斷，只是戰場從東北擴展到華北，中共在山東省境

113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5 月 22 日。

114 葉健青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卷 65，頁 597-598。

115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Vol. I, pp. 207-208.

116 王成勉，〈從和平到戰爭；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二階段之研究〉，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冊 3，頁 421。

內沿膠濟鐵路及津浦鐵路的南北方向，全力進擊濟南。為此，國府特派遣兩個軍進入山東，一往濟南、另一往青島，力求能有效制止共軍在華北的攻勢。[117]

6 月的停戰雖無疾而終，但一連串雙方交戰的結果，顯然國軍佔了優勢，這也使得國府對停戰條件的要求愈趨嚴厲。[118]中共將國軍的勝利歸咎為美國支持國民黨，也開始公開質疑馬歇爾的調處不中立。[119]在面對調停的空間愈趨緊縮之際，馬歇爾除了對國民黨施加更多的壓力，逼使蔣介石重回談判桌以外，也開始籌組第二管道，以求為調停注入新活力，企求能扭轉乾坤。

以前者論，在馬歇爾建議下，美國政府決定大幅緊縮對國府資助。首先，將原派駐在華北地區的 55,000 名海軍陸戰隊，裁減至只剩駐守青島的 4,000 人。[120]經過裁減，美軍不再擔負大沽到秦皇島的交通線，天津、秦皇島、塘沽的港口，北平、天津機場等處的安全。其次，他也將原先眾多預定的援華項目，逐一擱置，[121]其中包括美國進出口銀行的 5 億貸款。[122]此外，他也於 7 月 22 日要求國務院設法擱置國會正在審議的對華軍援法案，[123]而對國府造成最大傷害者，莫過於他要求國務院於 7 月 29 日開始對中國實施軍火禁運。[124]

117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Vol. I, p. 137。

118 例如 6 月 29 日，蔣介石所提停戰條件的前提是共軍必需從蘇北地區、膠濟鐵路沿線及承德等地區撤離。但到 7 月 9 日時，在上述撤離地區又開始添加安東省的安東市，而到 8 月 5 日時，則又將東北的共軍駐紮區域局限於新黑龍江省、嫩江省及興安省、其餘地區的共軍則需要一律撤離。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Vol. I, pp. 170-193.

119 1946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第一次開始在《解放日報》公開指責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援蔣內戰，是企圖取代日本，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頁 239。

120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43-444。

121 邵玉銘，〈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頁 49。

12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Vol. 10, pp.980-981.

12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10, p. 753.

12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10, pp. 753-757.

以後者論，他首先起用在中國長年經營傳教及教育事業的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爲新任駐華大使。復次，他又向蔣介石建議，在原有的三人小組以外，希望另成立一五人小組，專門研究如何組織國府委員，探索合組聯合政府的可能性，以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得以一併解決。在他努力斡旋下，此一建議終得以落實，該五人小組以司徒雷登大使爲美方代表並兼任主席，國府代表則由吳鐵城、張厲生出任，中共代表則是周恩來及董必武。[125]

雙管齊下可謂是馬歇爾在華調處第三階段的主要策略，但這兩步棋隨即皆因時不我予，遭遇瓶頸，最終束之高閣。以前者論，美國政府雖已對蔣介石採取一連串杯葛措施，卻仍無法動搖蔣對「以戰逼和」的堅持。也就是說，他雖知無法以軍事武力徹底剷除中共，但卻深信唯有掌握更多的軍事要地，才能逼使中共談和，才能爲和平建國奠基。

而支撐這份堅持的原因，除了在軍事上有全勝中共的把握外，對美國的援華政策，他也有捨我其誰的自信。在他認知中的美國對華政策原點，就是期盼中國能成爲一個民主統一的安定力量，而「還政於民」本是國民黨創黨理念。故他認爲若在此刻如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不僅能完成國民黨的傳統使命，也能達到美國對戰後中國的期許，屆時美國自會重開對華援助。[126]故此刻中美關係的低潮，好比是黎明前的黑暗，只需稍加忍耐，屆時必能柳暗花明。

再多的外在壓力，似乎並不能逼迫蔣介石改變他先求掌握軍事主導權的既定方針，尤其是承德、臺兒莊、張家口、安東、通化等戰略要地一一得以收復之際，[127]蔣對馬的訴求愈來愈不在意。而馬歇爾爲求打破僵局，自 10 月起只得將希望寄託國共兩黨以外的各民主黨派，希望他們能爲國共和談找到新的突破點。

---

125 蔡國裕，〈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關係之經過〉，《近代中國》，期 79（1990 年 10 月），頁 177。

126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Vol. I, p. 380.

127 承德是在 1946 年 8 月 29 日收復，臺兒莊是在同年的 9 月 2 日收復，張家口是 10 月 11 日，安東是 10 月 25 日，接著通化是 11 月 2 日收復。

在各民主黨派的努力下，到 11 月初時，國共之間的歧異已經形成國府要求各政黨提交制憲國大名單與同時發布停戰令，而中共則要求先改組國府和行政院，並要求無條件停戰。然此刻各民主黨派則對提交國大名單與否意見分歧。蔣介石先在 11 月 8 日宣布自 11 日起停戰，聲明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國民大會之名額，希望中共參加制憲，並出席軍事三人小組會議，同時允諾在國民大會閉幕後六個月內舉行普選。但到 11 月 11 日時，蔣介石又決定國民大會延期三天閉幕，以待各方提出國大名單。至此各民主黨派分裂已成，而周恩來也在 11 月 16 日向馬歇爾要求，安排他及其他中共代表團成員於 19 日啓程回延安，各民主黨派介入調處遂告一段落。[128]

12 月 25 日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後雖然順利閉幕，但國共雙方再無協商餘地，美國總統杜魯門於翌年 1 月 6 日宣召馬歇爾回國，並任命其爲國務卿。馬歇爾於 1947 年 1 月 8 日離華返美，同年 1 月 29 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聲明，終止美國政府與軍事三人小組及軍事調處執行部的關係，並撤回美國駐延安的觀察團。易言之，美國正式承認調停失敗，並宣布退出。[129]

從馬歇爾的新任命，就可知美國政府對他的信任及評價，不僅未曾因他調停國共失敗而受影響，反而賦予他更多機會參與決定今後美中兩國關係走向的新職務。易言之，他的就任新職，無非表示美國政府仍需借重他的中國經驗，故重新聚焦於他與蔣介石的互動，尤其是釐清兩者對國共和談必要性的認知爲何不一的具體史實，將有助於瞭解出任新職的馬歇爾，爲何會強烈主張美國政府不應再捲入國共內鬥，以及不願再積極援助國府的來龍去脈。

（四）蔣美矛盾的根源

1945 年 11 月 27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正式任命馬歇爾爲駐華特使，表達美國有意出面調停介入國共內鬥的同時，也對美國政府的調停方式有所說明。

---

[128] 王成勉，〈烽火下的調處：對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三階段的評估（1946 年 7 月-1947 年 1 月）〉，「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圓山大飯店，2001 年 10 月 6-9 日，頁 26-27。

[129]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42。

首先是在 1945 年 11 月 10 日時，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聲明：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將視中國政治穩定程度來決定。復次，1945 年 12 月 22 日，馬歇爾在面見蔣介石時，轉述杜魯門總統的訊息：其個人甚望大力援助中國，但仍需時時聽取議會與民眾之輿情。[130]這兩則訊息合併起來，可知美國對華的基本態度是希望幫助國府穩定政局，但由於美國是一個實施議會政治的國家，國內政黨的任何紛爭，皆可藉由各種民主機制的運作而謀和平解決。故美國國民樂見以和平化解歧異，而厭惡以武力鎮壓異己，對任何欲以武力解決紛爭的方式，美國國民皆會持否定的態度。

因為美國國民期待中國能和平穩定，發展經濟，成為美國的遠東市場，因此不支持國共內戰，便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軸。例如 1946 年 7 月 13 日，美國救濟總署公布停運對中國的救濟物質，起因在中國從事救濟事務的美籍工作人員 3 百餘名全體簽名，抗議國府將救濟物資當作政治工具，不肯平均分配運交給中共控制區。[131]此一事例，無非凸顯出在美國民眾心目中，對國共兩黨本無敵友之別。在此種觀念下，自然也會要求政府面對兩黨爭議，要秉持公正處理之心。這些訴求當然會對美國政府造成壓力，這也是 1946 年 6 月停戰協定失敗以後，國府恃其掌握軍事優勢，全力在山東發動攻勢，企圖打通膠濟路時，[132]馬歇爾為求將蔣拉回談判桌，只能對國府發出全面實施禁運軍火，以求反制的原因。

對於美國民眾的要求，蔣介石也是時有所聞，例如他在 1946 年 6 月 22 日的日記中，特云：「美國時代雜誌對我政治皆大加詆毀，而美國在華人士皆

---

[13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 795.

[131]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Third Deficiency Appropriation Bill for 1946: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Seventy-ni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6885*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pp. 247-248.

[13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9, p. 1457.

反對我軍事剿匪之準備。」[133]但蔣仍不爲所動，並堅守信念，他的信心，可從 1946 年 4 月 29 日，他爲準備與馬歇爾的談話，特於事先擬定以下談話主旨中一窺其究：

> 此時應明告馬歇爾，美國對東北之政策與對俄共之態度必須重加考慮且須速定，因此實為美國對東亞整個問題，消極退出乎，抑積極參加與領導乎。不可再蹈九一八時代消極退出，以致釀成第二次大戰之禍患，如果當時美、英對日稍用壓力，表示積極行動，則日本當不致如此猖獗，戰禍自可消除。今日東北之形勢亦復如此，此時對共既然不能空言威信所能制止，自然只有預備實力積極行動，協助我中央明示其決心，則共與俄皆可懾服，否則美國在東亞領導之威信決難維持，而第三次大戰亦必從此為起因矣。[134]

易言之，蔣認爲接收東北成敗，關乎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爆發，而美國如果希望不再重蹈覆轍，就必須幫助國府在東北取勝。此等將東北接收問題視爲第三次世界大戰導火線的看法，無非是要強調，蔣才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美國唯有全力支持蔣在東北取勝，才是最符合中美兩國利益。

將美蘇對峙加劇，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再起，視爲是爭取美國軍援的一大利多的心態，可從其日記中不斷得到證實。例如 1946 年 3 月 4 日的日記中，記曰：「近觀美國態度、國際形勢，第三次大戰之期不能太遠，似無過慮。」[135]此等美國絕不能棄我而去的心態反映在東北戰事，就是東北取勝的實質利益是高於其他國政事務，即使短暫引起美國不快，也不必在意。再如 1946 年 5 月 25 日，他在致行政院長宋子文函：「我軍進入長春，實於和平統一，只有效益，而毫無阻礙，請其放心，只要東北之『共軍』主力潰敗，則關內之軍事必易處理。」[136]易言之，決定國共內戰勝負的樞紐，既然在東北，如何在東北取

---

133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6 月 22 日。
134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4 月 29 日。
135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3 月 4 日。
136 葉健青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卷 65，頁 585-586。

勝，便是他優先的考量。但是爲了要降低與美國的摩擦風險，他也會考慮動手時機。例如他於 1946 年 8 月 31 日的日記中，記曰：「巴黎會議未決期間，俄在東北與內蒙當不致公開搗亂，支援共同干涉我內政，如我有實力，此時解決東北與內蒙古之共匪最合機宜。」[137]這些具體史實，在在證明蔣並非不知與美國交惡的風險，只是認爲今後國際局勢的發展對他有利，故現階段與美國交惡，不會妨礙日後雙方的友好發展。

蔣介石對軍事作戰的迷思，以及認爲美國決不會棄他而去的信念，對國共和談已構成障礙一事，也可從馬歇爾致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得到證實。例如 1946 年 9 月時，馬歇爾就指出，蔣也知他無法用武力殲滅中共，但認爲取得某些戰略要地，將有利於今後談判，故樂於爭戰。[138]此外，馬歇爾於 1946 年 10 月 5 日的報告中，就強調蔣以爲實行軍事行動即可將美國拖進漩渦。[139]也就是說，蔣不怕國共和談不能和平落幕，反而認爲衝突愈大，美國出手援助他的機會才會愈大。也因爲蔣介石有這些異於常人的信心，故他執意一切事務皆以軍事優先。而他信念之強，可見諸於馬歇爾於 1946 年 12 月 1 日致國務院的報告，轉述蔣介石對中國時局的觀察，蔣認爲國軍能在 8 至 10 個月內殲滅中共，通貨膨脹問題雖嚴重，但只限於都市。[140]

蓋蔣對美國的政局的理解，與現實顯然有很大的落差，爲何造成如此差距？前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曾作如下的評析：「蔣委員長的對美交涉仍沿用舊時代的宮廷外交模式，未曾考慮運用民主的手段來影響美國的輿論，在這個以關說、宣傳以及勒索爲爭取美國援助的現代社會，蔣委員長的個人外交自然得不到大眾的關注。」[141]易言之，所謂民主政治，也是選舉政治，所有

137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8 月 31 日。

13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 183.

13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10, p. 291.

14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10, p.577.

141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p. 190.

的政策走向皆有賴選票及公意檢驗時，政治家的前途及評價，自然皆不可忽視民意。可是對依靠武力及黨的意志而得以崛起的蔣介石而言，顯然不易體會美國政治家所背負的公眾壓力。例如他在 1946 年 3 月 31 日日記中，就批評馬歇爾將調和國共內戰視為個人志業，故求成功，不惜盡懷柔中共之能事。其主張撤銷駐華美軍總司令部及撤海軍陸戰隊，是因在乎美國輿論等等。[142]此外，他於 1946 年 5 月 24 日特記下：「馬歇爾不問我國之利害禍福，亦不顧其本國之政策如何實現，而惟以其個人功利之失敗與緩急是圖。」[143]1946 年 11 月 7 日日記中，又指責馬歇爾所提的停戰宣言：「彼徒注意美國心理，而不知此應以我國內部為主體也。此誠一頑固單純之軍人，只有其個人主觀而不知其他也。」[144]

從這些指責中，可知蔣介石將他與馬歇爾在針對國共和談所產生的種種磨擦，歸類為兩人關注重點不一所導致時，卻忽略了雙方因面對的政治體制不同，背負的政治責任不同，才更是導致雙方無法超越歧見的根源所在。尤其是一個要面臨選舉檢驗，並有任期制度壓力的民選政府，所有的外交決策皆必需考慮政治成本。這也是肯楠（George F. Kennan）倡導圍堵政策並用政治成本的角度，強調選擇戰後新生的日本作為亞洲的首要反共盟友，將會比積極支持蔣介石政權贏取國共內戰，更符合美國政治投資效益的論述，為何立即被國務院採納成為美國遠東新政策的緣由所在。易言之，美國對蔣介石的棄守，與美國的新亞洲政策成形密切有關，而箇中原委，自得從圍堵概念的發展過程說起。

四、圍堵概念與冷戰局勢的成形

蓋「圍堵」（Containment）政策的概念，首見於原美國駐蘇聯代辦肯楠在 1946 年 2 月向美國國務院所提出的外交建言。在此一報告中，他強調共產革命後的蘇聯，除了承襲俄國的傳統歷史經驗以外，又加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

142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3 月 31 日。
143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5 月 24 日。
144 〈蔣中正日記〉，1946 年 11 月 7 日。

薰陶，使渠等在對外事務上，堅守以下信念：首先是認爲唯有不斷地擴大勢力範圍，才能確保國土安全；復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可共存，尤其是爲了壟斷生產資源，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必會朝向帝國主義發展，亦必以挑起戰爭作爲擴大陣營的手段。[145]

（一）圍堵思維與美國全球戰略

在指陳美蘇兩國在本質上不可能共存的前提後，他認爲今後美國的生存之道，首要在於有效遏制蘇聯對外擴張。雙方的決戰樞紐，定奪於各自對工業區域的控制。尤其是環顧世界，總計只有美國、英國、萊茵河流域、日本以及蘇聯等 5 個工業中心。[146]若美國能繼續掌握目前擁有的 4 個工業中心，並適時制止蘇聯繼續對外擴張，[147]則美國不僅有望逼使蘇聯放棄一貫的擴展政策，甚至還有瓦解其政權的可能性。

當蘇聯在東歐、中東及遠東各地強勢推行其擴張政策，逼使美國需要新的對應策略之際，肯楠卻適時爲美國指引一條反制之路，故美國政府遂決定將他的圍堵理念，逐一落實爲美國對外政策的新指標。尤其是 1947 年 1 月新上任的國務卿馬歇爾，更將他的建言奉爲金科玉律，一一採納。1947 年 5 月，還特地爲他量身打造國務院政策企劃部（Policy Planning Staff），並任命他爲此新部門的部長，目的就是冀望援用他的圍堵觀念，替美國設計一部能在全世界有效遏制共產勢力向外滲透的新國際戰略。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及對日和約的再檢討，則是他的圍堵觀念在歐亞兩大洲具體落實的代表實例。前者的正式名稱爲「歐洲復興計畫」，是美國爲幫助歐洲早日重建經濟體系的

145 "The Chargé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Vol. 6, pp. 696-709. 此一電報內容，爾後經肯楠改寫後，在《外交政策》雜誌上正式公開。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4 (July 1947), pp. 566-582.

146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p. 359.

147 在本書出版時，則已將萊茵河流域定義爲西德。John W.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Florida: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92), p. 36.

新布署。[148]眾所周知，此一計畫除了讓絕大多數參與國的經濟恢復到戰前水準，亦因得力於經濟快速復甦，使政治趨於穩定，爲抵制國內外共產勢力的擴張或滲透發揮防火牆的作用，並爲爾後歐洲共同體的發展提供整合的基礎。

關於亞洲方面，肯楠於 1947 年 8 月起，開始進行美國對日政策的再檢討作業，[149]主要是反對國務院遠東局東北亞科長鮑頓（Hugh Borton）於 1947 年 3 月 19 日所著手設計的對日和平條約草案。有鑑於該草案首先依據國務院、陸軍、海軍協調委員會（State-War-Navy Coordination Committee）於 1946 年 6 月 24 日會議結論，[150]主張要將琉球歸還日本以外，並將日本的非軍事化、非武裝計畫以及受遠東委員會成員國的長期監督列爲主要內容。[151]易言之，這份草案仍是反映美蘇同盟體制時代的舊思維產物。特別是將解散財閥、禁止企業壟斷等經濟體制改革亦視爲落實民主化的重要指標時，對原本仰仗企業集團推動國家經濟建設的日本而言，自然是一種懲罰性質的牽制行爲。此外，處理戰後日本佔領事務，雖然由美國一手統籌，但名義上，遠東委員會仍是佔領事務的最高行政機構，其法源基礎則是來自於 1945 年 12 月 16 日，中、美、英、蘇四國外長於莫斯科召開的聯席會議。是以，和平條約簽訂後的日本仍得受遠東委員會成員國監督的安排，無非爲蘇聯保留了可繼續插手日本事務的權利。

對肯楠而言，爲有效在全球推展圍堵政策，尤其是在亞洲落實的成敗關鍵，在於如何不讓日本落入蘇聯控制。因此，他反對將日本長期置於遠東委員會成員國的監督之下，[152]並極力爲美國營造能長期掌控日本的機會。他對日本事務的投入，反映他在接任國務院企劃部部長後，急欲調整美國遠東政策的強

148 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0.

149 宮里政玄，〈アメリカ合眾国政府と對日講和〉，收入渡邊昭夫、宮里政玄編（下略），《サンファンシスコ講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1986），頁 113-116。

150 “Memorandum by Myron M. Cowen, Consul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Part 2*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Vol. 14, p. 1117.

151 最初是由中國、美國、英國、蘇聯、菲律賓、印度、澳洲、紐西蘭、法國、加拿大、荷蘭等曾參與對日作戰的 11 個同盟國合組而成，爾後緬甸、巴基斯坦又於 1949 年 11 月加入。

152 宮里政玄，〈アメリカ合眾国政府と對日講和〉，收入《サンファンシスコ講和》，頁 113-116。

烈企圖心。但在此一時期，他對遠東區域的主要關心，主要集中於對日政策的重新規劃，還無餘力檢討中國政策，故此時期有關國務院對華決策，主要還是由馬歇爾親自把關。

（二）東北局勢失控與美國對日媾和政策的新構思

馬歇爾認爲導致調停國共衝突失敗的眾多因素中，國民黨內反動分子的牽制實爲關鍵。此一認知，即便在他 1947 年 1 月出任國務卿後，依然如故。尤其是他認爲必先除去國民黨內反動分子，否則國共和談無望，故多次拒絕國府向美國政府提出的經援要求。例如他於 1947 年 2 月 17 日，拒絕國府向美國政府提出的棉花及小麥的信用貸款，理由是中國的反動分子仍當道。[153]5 月 8 日更以國府雖宣布政府改組、撤銷國防最高委員會，但在國民黨內恢復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員會，陳立夫仍能榮任秘書長爲例，[154]表示對國府改革誠意的質疑。[155] 7 月 3 日，再度強調中國的難關，要靠中國人自身團結自救來解決，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一切皆以取得實質效益爲依歸。[156]

這一連串拒絕中國的經援要求，並不是馬氏的新人新政，其起源還是來自於 1946 年 7 月他擔任特使時期所訂的政策。只是當年設定此等政策時，國府仍居軍事優勢，還具備主導和談走向的實力。不料國共關係在美國正式宣布退出調停，進入全面軍事對決以後，原本處於軍事優勢的國軍，[157]於 1947 年 3 月 19 日攻佔延安之後，開始出現軍火供應不足、兵力分散以及士氣不振等眾多影響戰力的因素。其中，首度失利於山東戰場，其次爲東北。1947 年 1 月

15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Vol. 7, pp. 1070-1071.

154 國民黨中常會於 1947 年 4 月 17 日宣布新國府委員名單及中央政治委員會成員名單。〈國防會即撤銷．國民黨恢復中政會〉，《大公報》，1947 年 4 月 18 日，第 2 版。

15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p. 1114-1115.

15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pp. 213.

157 從 1946 年 7 月起，國軍在關內外各戰場皆有不錯戰績，總計收復了 105 座城市。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407。

至 5 月間，山東歷經魯南、萊蕪及孟良崮 3 次戰役，皆以國軍潰敗收場，總計損失達 19 個師，影響軍心甚鉅。[158]東北方面，則是自 5 月開始面臨共軍的反撲，國軍雖成功解救四平之圍，但也折損 7 師，[159]讓東北局勢出現變化，共軍自此開始逐漸掌控戰略的主動地位。[160]

在上述兩個代表共軍「反守爲攻」的戰場上，蘇聯皆扮演關鍵性角色。尤其是 1946 年 5 月以後，國軍在東北戰場無往不利，不僅成功進佔長春，更有趁勝越過松花江，往北滿發展之勢。處此情勢，中共不得不向蘇聯求援，表示蘇聯若再不出兵相救，只得接受國民黨議和條件，讓出哈爾濱、齊齊哈爾、滿洲里、佳木斯等北滿地區的各大戰略都市。[161]面對中共的緊急求援，蘇聯決定全面支援中共。只是爲了避免因公然出兵觸怒美國之虞，故改以支援中共在山東開闢第二戰場的方式，來減輕關外壓力，讓國府首尾難以兼顧。[162]

爲求反制中共在蘇聯援助下的「反守爲攻」，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特於 1947 年 6 月 9 日提出對華政策建言，分別以（1）爲防止蘇聯取代美國在中國的地位；（2）爲阻止中共與蘇聯的進一步結盟，讓中共在國共內鬥中取得優勢；（3）爲防止國府在聯合國的地位，因內戰失利而蒙受傷害等三個不同理由，強烈主張對國府積極援助。[163]

面對國府在內戰的失利，美國國務院自然也警覺到軍火禁運對國府所造成的傷害，已達到足以影響國府的安危，因而於 1947 年 6 月 27 日，宣布將戰爭時期按中國規格特別製造的 1 億 3 千萬 7.92 毫米步槍子彈，以剩餘物資價格出售給國府。然也因此一武器交易，使得美國正式解除對中國的軍火禁運。不

158 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頁 141-146。
159 熊式輝，《海桑集：熊世輝回憶錄（1907-1949）》，頁 603。
160 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頁 149。
161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頁 506-507。
162 蘇聯將原本於北朝鮮所虜獲的日軍武器，假道安東以海路運抵山東煙台，接濟由陳毅所率領的華東野戰軍，讓中共得以順利拓展山東戰場。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頁 507。
163 吳昆財，《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1947-195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頁 100-103。

過，對於此一解除軍火禁運政策，國務院並不願給外界過度詮釋的空間，馬歇爾還特地在 7 月 2 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此舉並不代表「美國政府在內戰中支持國民政府」。[164]

從馬歇爾對處理解除軍火禁運一事已可看出，他雖無意逼使國府陷入絕境，但他也不願過度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此等極欲與國府保持距離的心態，充分反映他急欲爲美國創造更多可進可退的操作空間，而非與國府，特別是與蔣介石的執政命運綑綁一起，已成爲此時期馬歇爾對華的基本態度。也由於此等欲保留彈性的心態，馬歇爾對軍方應極速援華的建言，雖不願呼應，但也不願即刻表態拒絕。因而提出以商請魏德邁出馬，並招募財政部、國務院、海軍部和公共關係部門的財政、經濟、政治和工程技術等各方面專家組織一考察團，[165]對中國及韓國作一全面考察後，再來重新擬定對華政策的方案，而與軍方達成妥協。

魏德邁訪問團於 7 月 17 日抵達南京，於 8 月 24 日離華。在華訪問期間曾親赴東北、華北及臺灣實地考察，並於 9 月 19 日正式向杜魯門總統上呈調查報告書。[166]報告中指稱，中國局勢日趨惡化，首先是政府的入不敷出，歲入只達支出的 1/3，而支出中僅僅軍事一項卻高達 70%。然全國政務，雖皆以剿共爲首務，但東北戰事卻顯然已陷入萬劫不復、無法挽救的局面，中共應在近日內就會全面掌控東北。東北落入中共之手，結局就會像外蒙古一般，自然會成爲蘇聯的附庸國。爲阻止東北淪爲蘇聯附庸，唯有設法由聯合國出面促成中國東北停戰，將東北交由聯合國託管，以免中國東北成爲蘇聯的附庸。[167]

易言之，魏德邁認爲即使有美國援助，東北仍會喪失，唯有求助聯合國一途，才能阻止東北全面淪陷，同時美國應全面介入內戰，不僅應挹注大規模的

---

164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分冊 6，頁 165。
165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分冊 6，頁 170。
166 李恩涵，〈一九四七年魏德邁中國調查團事件經緯〉，《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頁 403-409。
16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p. 767-770.

經濟援助，還更需派遣萬人規模的軍事顧問團到中國。[168]強調唯有如此決心，才能幫助國府挽回劣勢，亦為他的訴求重點。

正當騎虎難下的蔣介石，除了無法接受魏德邁立即放棄東北的建言以外，也聽不進魏德邁於 8 月 22 日在國府主席官邸發表的臨別箴言：痛責國府貪汙橫行，亦大量經營企業，與民爭利，據此要求其應力求改革，以爭取民心等。[169]蔣因而於 8 月 22 日日記中寫下：「魏德邁對我政府首腦部之談話無異嚴厲之訓詞，類似斥責裁判，實為我國最大之侮辱。」[170]為了抗議魏德邁的發言不當，他特地要外交部長王世杰通知駐美大使顧維鈞，即刻停止和美國進出口銀行的所有信貸交涉，[171]表達國府絕不會因為區區經援，而平白接受美國頤指氣使的決心。

至於美國政府，也對魏德邁的考察報告感到棘手，尤其是針對東北交由聯合國託管以及派遣萬名軍事顧問支援國共內戰的兩大建言之善後處理方式，深感困擾。以前者而言，美國軍方早於 1946 年就作過評估，當時就已斷定窒礙難行。以後者言，在美軍已大量復員及國防預算又大部削減的情況下，美軍實無人力及經費承擔此一巨大軍事任務。但在現實上美國既然無力解決此等難題，自然不便在此一議題上再為國府增加困擾。也就是說，為了不影響國府軍心，美國國務院決議不公布此一報告，免得讓世人知曉，美國對國府在東北的戰局已持絕望態度。[172]

有鑑於東北應否放棄的議題上，中美兩國政府已陷入毫無交集之僵局，原本企圖藉由參照魏德邁報告，再擬定對華政策的計畫，最後因報告不被採納，又被逼放棄。當新政策無法順利出爐，而美中兩國政府的溝通管道又陷入瓶頸之際，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只能原地踏步。而此等不作為政策繼續推行的代價，

---

168 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750* (New York: Norton, 1989), p. 441.
169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 8，頁 737。
170 〈蔣中正日記〉，1947 年 8 月 22 日。
171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分冊 6，頁 193。
172 李恩涵，〈1947 年魏德邁中國調查團事件經緯〉，《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頁 411-412。

就是 1947 年的最後四個月中，共軍在黃河、長江之間和漢水以東地區步步前進。[173]

在馬歇爾計畫已確定有西歐、南歐及北歐的 16 國參與，而蘇聯以及東歐的所有共產國家卻表明杯葛，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峙情形已逐漸呈現之際，日本外務大臣芦田均，則於 1947 年 9 月 13 日以私人身分遞交了一份備忘錄給即將回國的美國第八軍司令官艾克爾柏格（Robert L. Eickelburger），表達日本政府對日本安全保障的看法。在這份備忘錄中，芦田以美、蘇是否交惡為兩個前提。首先，若美、蘇友好關係得以維繫，則日本的安全可全權交由聯合國負責。其次，若美、蘇關係交惡，則期許藉以下兩個代替方案保障日本的國防安全。第一，和約簽訂後，美國以監督和約履行為名，繼續駐軍，讓日本仍可置於美國的保護傘下，享有實質上的安全保障。第二，日、美兩國簽訂特別協定，日本的防衛委託美國負責。[174]這份以私人管道所遞交的備忘錄，美國政府並沒有正式回應，但從芦田所提交的備忘錄中，則可知曉日本政府已有投靠西方陣營的覺悟。而日本政府的決心反共，對原本就有意提倡要扶植日本作為亞洲反共堡壘的肯楠而言，自然是一大喜訊。

在得知日本政府已決心要成為美國忠實盟友之後，肯楠於同年 10 月 14 日，向國務院提出一份「對日和平條約的前提」，表達他的基本立場。肯楠認為值此美蘇全面對決已難避免之際，美國國務院仍拘泥於維繫戰爭時期美蘇同盟體制的懲罰思維以構思媾和政策，令人感到時光倒流、啼笑皆非。[175]他主張美國在推動對日媾和政策之前，得先做好下列的部署：首務是要在日本建立一個政治安定的親美政府；其次，要復興日本經濟，讓日本成為亞洲世界中非共產國家的經濟復興的模範；最後，要盡一切努力，防止恢復主權地位以後的日本，落入共產勢力範圍。此外，為確保獨立後的日本仍能堅守自由陣營，美國

173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分冊 6，頁 276。
174 渡邊昭夫，〈講和問題と日本の選擇〉，收入《サンフアンシスコ講和》，頁 35-37。
17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7,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Vol. 6, pp. 537-543.

必須對日本提供安全保障。而爲求有效落實此一安全保障，日本需負責提供美軍相關的軍事設施，並在美軍的指導下維持一支足夠維護海上及陸地治安的警察武力。

對肯楠的主張，以鮑頓領軍的國務院遠東局東北亞科全面反擊，認爲美國若只求與日本結盟而不顧其他盟國的觀感，只會迫使其他亞洲太平洋國家遠離美國，使得美國得單獨負擔整個亞洲太平洋防線。再者，復興日本經濟，也非單憑美國一國就可達成，美國仍需要其他盟國的協助。何況，美國國會是否願意經援日本還是一未知數的情況之下，肯楠的提案，純屬空中樓閣，沒有現實基礎。[176]

在面臨國務院內同仁的強烈質疑之下，肯楠爲求對日政策的周延，還特地到東京及琉球、菲律賓等地實地考察。在和麥克阿瑟及遠東地區軍區負責人舉行會談以後，於 1948 年 3 月 25 日再向國務院提出「美國對日政策建議案」。在這篇新的建言報告中，他主張美國應暫緩推動對日本的和平條約以及應保留琉球。[177]

（三）保留琉球與扶植日本政策的成形

在戰後的歷史中，主張要保留琉球者，肯楠並不是第一位，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早於 1945 年 10 月 23 日，就曾針對美國在全球的海外基地的重要性，作了一綜合性評估。在此一編號 570-40 的評估案中，琉球與菲律賓、馬利安納群島（Mariana Islands）、夏威夷、巴拿馬運河、美國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等地區並列爲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核心基地。[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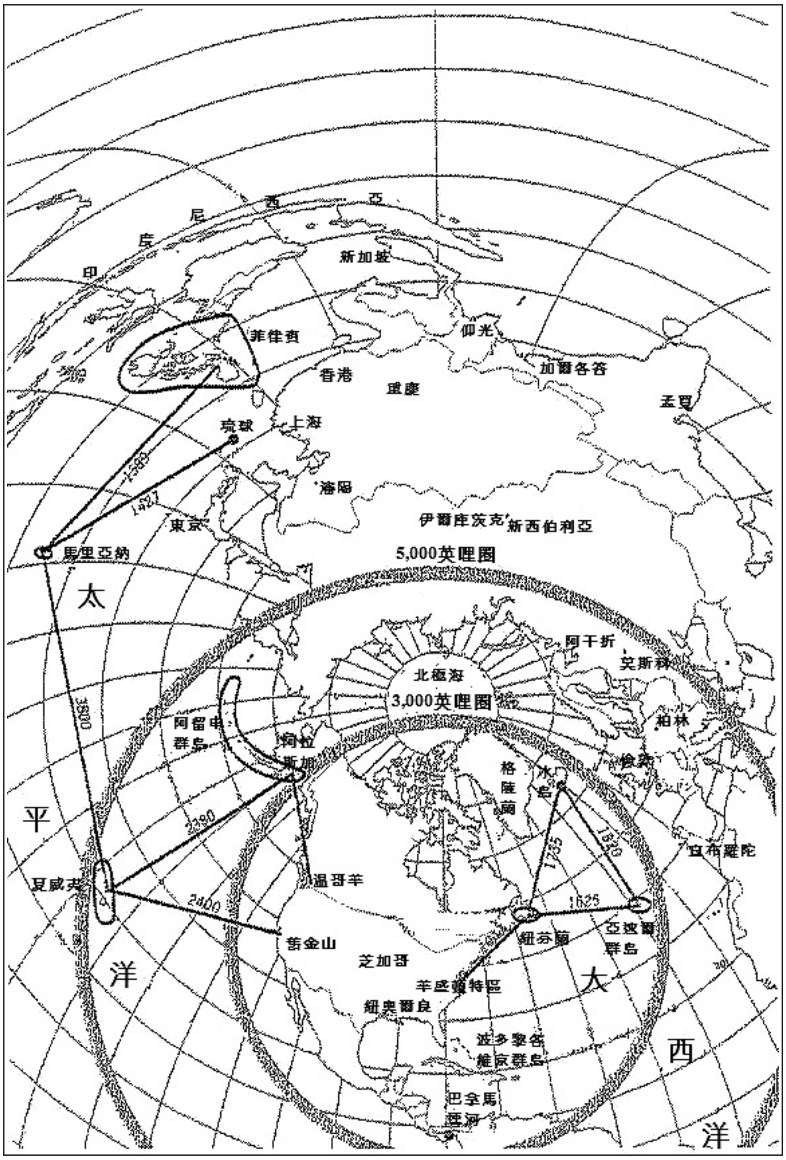
---

176 宮里政玄，〈アメリカ合眾国政府と對日講和〉，收入《サンファンシスコ講和》，頁 116。

177 “PPS/28: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S. Policy toward Japa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Vol. 6, p. 692.

178 大西洋地區有加拿大的紐芬蘭（Newfoundland）、波多黎各（Puerto Rico）、維爾京群島（Virgin Islands）、北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Azores）以及冰島（Iceland）等地。我部政明，《戦後日米関係と安全保障》（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頁 36-39。

圖 1　1945 年美國在全球的重要軍事基地



資料來源：修改自我部政明，《戦後日米関係と安全保障》，頁38。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認爲琉球位居於阿留申群島到中途島、馬里亞納及菲律賓之間，構成的 U 字型美國太平洋海域安全維護區的中心位置。只要掌握琉球，美國不僅可封鎖東北亞地區所有的港口，也有能力應付任何來自亞洲大陸地區的軍事挑戰。[179]也因琉球的位置特殊，美國軍方的最初構想是，先將琉球與小笠原群島送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戰略信託統治，然後再由聯合國委託美國代表統治。[180]此一構想也立即得到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元帥的認同，並於同年 1 月 29 日發布行政命令，將琉球與鬱陵島、竹島、濟州島、千島群島、齒舞等地並列，定位爲非日本政府行政管轄區。[181]

對於美國軍方企圖要將琉球從日本版圖劃出一事，美國國務院持反對態度，其理由是：此一企圖違反美國的參戰精神，不擴展領土乃美國戰爭期間對大西洋憲章的詮釋，[182]是得到同盟國肯定及認同的最重要外交原則。就此而言，美國不能因垂涎琉球的戰略地位而自毀長城。況且染指琉球，也必定得罪蘇聯。且爲維繫美日兩國的友好關係，美國也不應掌控琉球。將琉球設定爲非軍事區歸還日本，就成爲 1946 年 6 月 24 日國務、陸軍、海軍協調委員會上的最終結論。[183]

當肯楠實地訪問琉球，讓他親身體認琉球戰略位置優越性後，他深深認同麥克阿瑟的說詞：「琉球可使美國空軍掌控從海參崴到新加坡之間的制空權，

---

179 宮里政玄，《日米関係と沖縄，1945-1972》（東京：岩波書店，2000），頁 27。

180 河野康子，《沖縄返還をめぐる政治と外交：日米関係史の文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頁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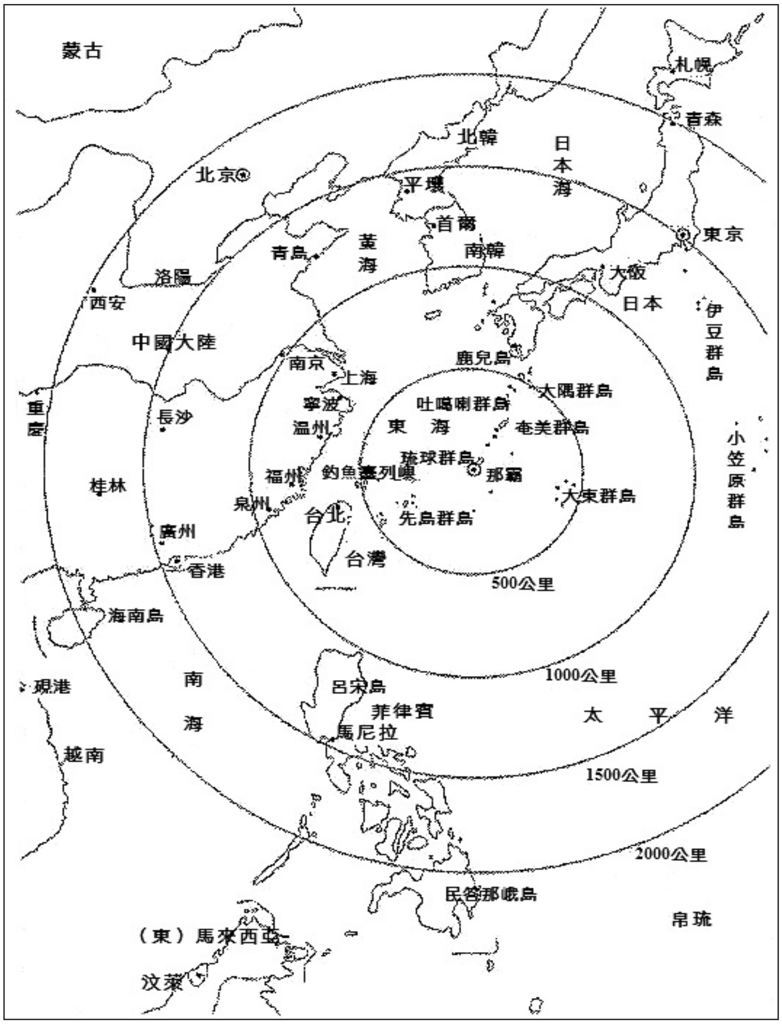
181 朝日新聞安全保障問題調査会編，《アメリカ戦略下の沖縄》（東京：朝日新聞社，1967）頁 99；"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Government Section, 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ed Powers,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September 1945 to September 1948*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 477.

182 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是 1941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美英兩國領袖具名向全世界表達他們對維護國際秩序的看法，強調不擴張領土、國家主權平等、公海自由航行權是其主要內容。

183 "Memorandum by Myron M. Cowen, Consul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Part 2,* Vol. 14, p. 1117.

使美國可輕易一舉摧毀這一帶沿岸的所有敵軍以及所有的港灣設備。此外，僅憑琉球一地，就足以保障日本安全，琉球足可應付所有外來對日本侵略的挑戰。」[184]

圖 2　琉球的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修改自赤嶺守，《琉球王国：東アジアのコーナーストーン》（東京：講談社，2004），頁7。

184　宮里政玄，《日米関係と沖縄，1945-1972》，頁 28。

經過三次與麥克阿瑟的會談後，肯楠於 1948 年 3 月 25 日對國務院提出編號 PPS28 的美國對日政策建議案。建議案重點有二：一是主張美國應暫緩推動對日本的和平條約。他認為在蘇聯的威脅未解除之前，以及日本又無法再武裝的情況之下，進行和平條約的談判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至於今後和平條約的進行時機，他認為應視當時的國際環境以及日本國內政壇的安定程度而定。[185]復次，強烈主張要保留琉球，並指陳琉球除具有優越的戰略地理位置，在政治環境上，也比日本本土及菲律賓更適合扮演美國海外軍事要塞的角色。[186]故要求美國政府編列預算，以便打造一個能適合美軍長期駐軍的軍事基地。這篇建言，爾後就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以下簡稱 NSC）第 13 號一系列文件的主要骨幹，並陸續得到杜魯門總統的批准。[187]

（四）「棄中扶日」新政策的底定

當肯楠的日本論述，尤其是將美軍的佔領日本政策從懲罰改為扶植以及保留琉球的主張，已逐一被國務院認同，並調整為美國對日政策以後，在此一時期，與他的政策相呼應的是美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於 1947 年 5 月 12 日共同聯名所撰寫的「美國對外援助的政策、程序及成本」（Policies, Procedures and Cost of Assistance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eign Countries）的報告。在這篇以美國的安全保障需要及各國對美國所能提供的實質回饋為觀察視野，而嘗試對盟國再評價的過程中，將中國列名第 14 位，遠低於第 8 位的日本及第 13 位的韓國。其理由是中國的得失，不僅不會危及美國的安危，而中國今後的走向，無論是

185 "PPS/28: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S. Policy toward Japa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Vol. 6, p. 692.

186 "PPS/28: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S. Policy toward Japa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Vol. 6, pp. 700-701.

18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ia*, Vol. 6, pp. 857-862;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Japa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9*,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Part 2*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7, pp. 730-736.

親美或親蘇，所能發揮的作用皆有限。以前者論，除非美國投入大量糧食及物力，中國不會成爲一個有用的盟友；以後者論，與中國爲敵並不可畏，美國僅以經濟封鎖，就足以孤立中國。[188]

爲了把握這一股重新檢討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浪潮，肯楠於 1948 年 2 月 24 日提出一份「審思目前局勢」（Review of Current Trends）的報告，並介紹以下觀察：首先，他認爲美國的政治哲學與生活方式根本無法適用於亞洲，美國以世界百分之六點三之人口，佔有世界百分之五十之財富，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也讓美國不可避免地會遭其他國家嫉妒與怨恨。對美國而言，如何在不危及國家安全的前提下，繼續維繫這種優勢，應列爲外交的首要工程，而不應過度投入協助他國事務。復次，他認爲當中國及印度等亞洲國家仍處於人口增長壓力及食物分配不足等窘境，蘇聯所倡導的共產主義自然會較美國所提倡的民主政治更具魅力。美國不應將「人權」、「提升生活水準」和「民主化」等核心價值理念的推廣，作爲對外政策的指標，反而應務實地將對外政策限定在如何維繫美國的安全、保障美國利益。在此一思維下，他將日本及菲律賓列爲維繫美國在遠東地區的關鍵要塞，主張要設法有效掌握。[189]

肯楠爲了持續宣導推動「棄中扶日」政策的必要性，又特地於 1948 年 9 月 7 日撰寫一份「美國對華政策的檢驗與認定」（To Review and Defin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的報告，強調美國應全面檢討對華政策。首先，他認爲美國對華政策的所有不當，是起源於美國的理想主義（Idealism）。正因此等不務實際的理念，讓戰前的美國，倡導門戶開放政策，主張各國應在中國享有機會平等的商業發展機會。延續至戰爭期的美國，亦將新對華政策標的定位改爲扶植中國爲戰後五大強權。但美國忽略的是，即使是在戰前的 1930 年

[188] 按此報告，美國援外名單的排列，依序爲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希臘、土耳其、奧地利、日本、比利時，荷蘭、拉丁美洲、西班牙、韓國、中國、菲律賓及加拿大等。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7, General;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 Vol. 1, pp. 738-750.

[18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Part 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 Vol. 1, pp. 523-526.

代，中美貿易只佔全美對外貿易總額的 4%，數額之微少，在在彰顯當年美國主導九國公約的不理性。再則，從戰前到戰後，蔣介石從未統一中國，也無捍衛中國主權的能力，而為了信守承諾，美國卻在戰後繼續支持蔣介石投入國共內戰，投入之多、獲益之少，都凸顯美國對華政策的荒唐。特別是以國府現狀之惡劣，除非美國能無限制投入人力及物力，否則無法挽回國府的頹勢。是以，倘若美國能及時擺脫理想主義，則就可發現過度評價中國，一直是美國傳統對華政策的盲點。尤其是按目前的中國人口壓力、人口素質及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即便中共得勢，淪為蘇聯的附庸，五年之內仍不能為蘇聯所用，更談不上能威脅美國。何況，中共是以民族主義起家，當中共臣服於蘇聯的傳統不平等關係，而必需要接受中國民眾公開檢驗時，日後雙方關係是否仍能保持融洽，他認為仍需觀察。[190]

這篇報告，除了反映肯楠認為國府在國共內鬥過程中必會以失敗收場的基本認知外，更重要的訊息是表露了美國對中蘇關係生變的期待。他認為以民族主義起家的中共，必定不會長期忍受蘇聯對中國的全面控制，尤其是蘇聯在東北以及新疆的作為，已明顯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南斯拉夫與蘇聯的公然決裂就是明顯例證，任何有血性的民族主義者，都不可能長期甘受蘇聯壓迫，何況毛澤東在中共的執政時期數倍於南斯拉夫總理狄托（Josip Broz Tito），毛比狄托更有條件反抗蘇聯。[191]

肯楠的論述顯然得到國務院的最終認同，這篇報告爾後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第 34/1 號文件的骨幹，代表美國政府面對國府全面潰敗時的初步結論。其要旨為美國應對中國內戰改持觀望態度，以求不再捲入中國內戰漩渦，也好為今後爭取與中共關係改善，預留空間。[192]

---

19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 Vol. 8, pp. 146-155.

19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 8, p. 148.

19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 Vol. 9, pp. 474-475.

然而，肯楠的「棄中扶日」論述，並不全然能得到眾多參、眾兩院共和黨籍議員們同意，例如以周以德（Walter Judd）眾議員而言，他認為中國才是亞洲的關鍵，若美國不能在中國力挽狂瀾、有效抵制共產勢力，則又如何期盼今後能守住印度、馬來亞、東印度群島等地？特別是當亞洲皆被赤化而無一倖免時，如何保證西歐仍能獨存？易言之，對經援西歐，落實圍堵政策，他本人並不反對，但對獨厚西歐卻置中國於不顧的作法，卻持反對態度。[193]為安撫國會，馬歇爾只得改提比 1947 年 11 月所擬幾乎高出兩倍的經濟援華方案。[194]使得參眾兩院於 1948 年 4 月通過給予中國 5.7 億美元的財政援助，還指定其中的 1.5 億美元為軍事物資。但對堅信國民政府已病入膏肓，任何援助都無法改變國民政府失敗的美國國務院，不僅沒有救人如救火的同理心，反而有意耽擱，讓此批美援軍火，直到 11 月國軍已輸掉遼瀋會戰以後，才終於送達。[195]

與蘇聯的實質援助相比，[196]1949 年美國政府對華的援助更是有名無實。雖然國會與軍方支持國民政府的意願不變，但國務院自始只求敷衍了事，故表面上國務院仍編列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預算，然在實際操作上卻刻意挪用他處。[197]此外，當元旦前後國軍在徐蚌會戰失利，長江以北絕大部分為共軍佔據以後，美國政府希望以副總統李宗仁和各民主黨派取代蔣介石，藉以促成國共再度和談，而有所謂「劃江而治」的和平運動。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更是熱心參與，推波助瀾，成為同年 1 月 21 日蔣介石引退的重要關鍵。[198]如此，美國不僅打擊國府民心士氣，更助長了中共提早席捲中國大陸的進程。

---

[193]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 466.

[194]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 472.

[195]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分冊 6，頁 379。

[196] 尤其是蘇聯自 1948 年 5 月起，對中共的支持已經是半公開化，當年就提供總值 3 億 3,540 萬盧布的各種武器、設備、戰略材料和工業產品，1949 年又增長為 4 億 2,060 萬盧布。此外，也前後派遣大批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帶著大批重型機械和設備儀器等，幫助修復完成東北 1,800 公里的鐵路線和 62 座大中型橋梁，並且協助中共建立了第一支技術兵種，約 30,000 人規模的鐵道兵部隊。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頁 508-524。

[197] Tang Tso,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 511-513.

[198]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45-446。

對肯楠而言，國府的慘敗本爲意料中之事，而爲了不讓中國的淪陷成爲國會攻擊政府失政的口實，他特於 1948 年 11 月時向馬歇爾建議，國務院應開始著手準備解釋戰後美國對華政策之經緯，以便爭取美國國民對政府的諒解。此項建議以及爾後進行的文書作業，便是 1949 年 8 月 5 日正式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的前身，[199]其中內附新任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致杜魯門函，更是出自肯楠的構思，[200]大意謂中國反共政策失敗，由於中國政府無能，中共效忠蘇聯，致使中國民族慘遭一以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爲前提的政黨所壓制。中國的悠久文化與民主、個人主義，終將發揮其力量，擺脫外國桎梏。美國對於以此爲目標的發展，應予鼓勵。但在採進一步行動之前，將先待亞洲塵埃落定。[201]這本主旨鮮明的白皮書，表面上雖是在爲美國對華政策辯護，但實際上卻清楚地表達在亞洲塵埃落定之前，不應對中國再採取任何具體行動。因爲美國已決定以日本取代中國，成爲亞洲反共的首要盟友，國府是否丟失中國，抑或中國是否改由中共執政，都已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

五、結　論

東北接收問題的複雜，在於事涉美、蘇、及國共四方勢力的相互競合，故沒有一方能僅憑一己之力掌控全局。尤其是美蘇兩國外交政策皆需適時反映當下兩國各自的全球戰略布局，影響所及，兩國的對華政策亦隨之時有變化，也造成國共兩黨的軍政布署亦不得不隨時配合調整。

[199] Paul J. Heer, *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4-45.

[200] Kelvin Peraino, *A Force So Swift*: *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New York: Crown, 2017), p. 131.

[20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Letter of Transmittal”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uly 30, 1949),”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p. XV-XVII;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754-756。

但因國共兩黨皆無法僅憑一己之力，尤需仰賴各自的國際奧援，才能在東北接收戰中取得優勢，進而完成各自的目標，所以外交的重要性顯然高於軍事。在面對東北接收事務時，將搶先攻佔東北戰略要點，視為優於國共和談進展的蔣介石，不僅讓美國有捲入國共內戰的危機，亦挑戰美國不願觸怒蘇聯外交的底線。而負責調處國共衝突的馬歇爾為逼迫蔣介石重回談判桌，除將原先眾多預定的美國政府援華項目逐一擱置，並祭出軍火禁運的強力手段，促使國府與美國關係自此日益隔閡，亦讓原本處於軍事優勢的國軍，開始出現軍火供應不足、兵力分散以及士氣不振等眾多導致戰勢逆轉的因素浮現。

相較於蔣介石對外交自主的堅持，毛澤東卻因在參與國共和談，及不以八路軍名義進軍東北等政策上，配合蘇聯的全球戰略，使蘇聯能將兩面外交發揮地淋漓盡致。特別是前者能讓蘇聯在表面上尊重美國可享有重整中國國內秩序的主導權及支持蔣介石繼續執政；後者卻讓蘇聯能在形式上完成《中蘇條約》的義務，將東北主權移交給國府，在避免為美國創造可直接軍事干涉東北事務的藉口之餘，也能暗地為中共提供各種方便。尤其是蘇聯將其在佔領東北期間所擄獲的日軍武器陸續轉贈給中共，以及讓中共大軍比國軍更早進入東北，這些安排對日後中共能在東北戰場勝出有最直接的貢獻。

蓋敵我相持，若一方得利，另一方必有所失，不能爭取美國全力支持的蔣介石，除個人的因素可資檢討以外，圍堵政策成為美國新全球戰略也是關鍵。以前者論，蔣介石不熟悉美國政治權力的運作模式，低估執政者所需背負的公眾壓力。此外，美國不願正面與蘇聯發生外交或軍事衝突，皆是蔣對美政策失敗的原因，過度高估自身在反共陣營的不可替代性，也是導致他容易陷入盲點的關鍵因素。以後者論，1947 年下半年起，在美國政府因國民政府東北戰局的失利而逐漸調降對中國的評價，日本政府反而於此時開始積極表態，願與美國政府簽訂和平條約，同時與美國結盟共同反共。也因此等國際情勢的變遷，「棄中扶日」的論述進而得以興起。尤其是肯楠認為在遠東地區，唯有改扶植日本保守勢力成為亞洲反共堡壘，才能更有效圍堵共產勢力在遠東地區的擴

張，尤其以成本效益而言，原本就具工業基礎的日本，自然比身陷國共內戰失利的國府更易扶植，因此導致美國政府決定不願再捲入國共內戰。而在若能掌控日本，就可不必在乎國共內戰的得失，棄守蔣介石並不會造成美國重大傷害的新思維下，美國遠東安全體系的重構及遠東國際社會的冷戰格局，也因美日關係的化敵為友而揭開新的序幕。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傅秉常致外交部電蘇俄政府聲明堅決反對任何軍隊在大連登陸〉（1945 年 10 月 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01-018，「革命文獻—接收東北與對蘇交涉（一）」。

〈熊式輝蔣經國等電蔣中正報告接收東北與蘇交涉經過情形〉（1945 年 10 月 1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103-00064-007，「日本投降（一）」。

〈顧維鈞致王世杰電〉，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外交部》，檔號 11-INO-00120，「聯合國總卷」。

"American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by Department of States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March 2, 1945," U. S. National Archives, 893.00/3-145.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 Discussing of United Stated Policy with Respect Thereto, Nov. 16, 1945," U. S. National Archives, 893.00/11-1645.

二、史料彙編

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王正華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卷 61，臺北：國史館，2011。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 8，臺北：國史館，2015。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945.1-1949.2）》，卷 1，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一）、（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蔡盛琦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卷 63，臺北：國史館，2012。

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

"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Government Section, 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ed Powers,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September 1945 to September 1948*.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Third Deficiency Appropriation Bill for 1946: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Seventy-ni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6885.*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945: Jul-Dec)*, Vol. 13,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Gene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tters*, Vol. 2.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Vol. 6.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Vol. 6.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9-10.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7, General; The United Nations*, Vol. 1.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7, The Far East*, Vol. 6-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Part 2*, Vol. 1.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Vol. 6.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 8.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9*,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Part 2*, Vol. 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 9.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Part 2*, Vol. 14.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Wedemeyer, 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58.

Marshall, George Catlett.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Vol I.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三、日記、自傳、回憶錄

〈蔣中正日記〉，1945-1947、1951，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分冊 5、6，北京：中華書局，1987。

四、報紙

〈國防會即撤銷．國民黨恢復中政會〉，《大公報》（上海），1947 年 4 月 18 日，第 2 版。

五、專著

五百旗頭眞，《米國の日本占領政策》，冊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3。

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吳昆財，《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1947-195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15。

我部政明，《戦後日米関係と安全保障》，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

李恩涵，《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汪朝光，《和與戰的抉擇：戰後國民黨的東北決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沈志華，《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北京：九州出版，2013。

沈志華，《冷戰的轉型：中蘇同盟建立與遠東格局變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赤嶺守，《琉球王国：東アジアのコーナーストーン》，東京：講談社，2004。

河野康子，《沖縄返還をめぐる政治と外交：日米関係史の文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宮里政玄，《日米関係と沖縄，1945-1972》，東京：岩波書店，2000。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49）》，卷 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朝日新聞安全保障問題調查会編，《アメリカ戦略下の沖縄》，東京：朝日新聞社，1967。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出版社，2010。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5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
關中，《中國命運 · 關鍵十年：美國與國共談判眞相（1937-1947）》，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10。
Heer, Paul J. *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Hogan, Michael J.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Kennan, George F.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LaFeber, Walt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750.* New York: Norton, 1989.
Levin, Steven I.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raino, Kelvin. *A Force So Swift: 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New York: Crown, 2017.
Spaner, John W.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Florida: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92.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Tanner, Harold M. *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 Siping, 194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Westad, Odd Arne.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六、論文及專文

牛軍，〈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蘇國共關係〉，《歷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84-103。
牛軍，〈戰後初期美蘇國共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鬥爭〉，《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頁 217-243。
王成勉，〈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一階段之研究〉，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2，頁 761-790。

王成勉，〈從和平到戰爭；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二階段之研究〉，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冊 3，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頁 406-433。

王成勉，〈烽火下的調處：對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三階段的評估（1946 年 7 月-1947 年 1 月）〉，「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圓山大飯店，2001 年 10 月 6-9 日，頁 1-34。

朱元石，〈劉少奇與抗戰結束後爭奪東北的鬥爭〉，《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頁 124-145。

邵玉銘，〈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頁 43-110。

陳立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之背景、經過及其檢討〉，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冊 2，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1，頁 362-392。

陳立文，〈從東北接收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聯經出版，1996，頁 312-344。

陶文釗，〈馬歇爾使華與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世界歷史》，1986 年第 2 期，頁 40-48。

蔡國裕，〈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關係之經過〉，《近代中國》，期 79，1990 年 10 月，頁 167-183。

宮里政玄，〈アメリカ合眾国政府と對日講和〉，收入渡邊昭夫、宮里政玄編，《サンファンシスコ講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1986，頁 113-144。

渡邊昭夫，〈講和問題と日本の選擇〉，收入渡邊昭夫、宮里政玄編，《サンファンシスコ講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1986，頁 17-56。

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4 (July 1947), pp. 566-582.

Postwar Manchuria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Huang Tzu-ch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failure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take over Manchuria and the U.S. policy of "abandoning China and supporting Jap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d Wa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background of how the U.S. government changed its policy from initially supporting China to supporting Japan after Japan's surrender,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basic attitudes of Chiang Kai-shek, Mao Zedong, and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toward Manchuria and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also compa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creasingly divergent view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the U.S. with the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views between Mao Zedong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ir specific impact on the deployments ordered by Chiang Kai-shek and Mao Zedong in Manchuria. Finall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the U.S. government counteracted the Soviet Union's breach of trust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how it pursued the policy of containment in favor of propping up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s an anti-communist bulwark in East Asia.

Keywords: postwar Manchuria, Cold War, policy of containment, Kuomintang-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ace talk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